



二十世紀全紀錄

1962

周麗琮 主編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彭德怀上万言书申冤	1
文学家胡适出生	8
雷锋同志因公殉职	25
小资料	26
世界部分	28
世纪回眸	28
《寂静的春天》的首次出版发行	28
西萨摩亚独立	42
美洲国家组织革除古巴	43
美国禁止对古巴的贸易	60
美苏载人宇航飞行的探索与成功首开世界先河 ..	68
乌干达自主	84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订停火协议	86
布隆迪独立	108
卢旺达独立	108
英法于 1962 年签署合作协议制造协和号飞机 ..	109
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被处死	111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逝世	120
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逝世	124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逝世	124
小资料	126

据地而不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那坦坦忠心、荡荡赤胆和敢挑重担的高贵品质，使委员们折服了。之后，他又深入四个大队，向战士们讲明保卫井冈山的战略意义，鼓励大家同心同德，勇敢顽强地痛杀“会剿”之敌。

彭德怀率部接过了五大哨口驻防任务，全力以赴做反“会剿”的准备工作。他带领基层的指挥员，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向前委提出了一系列守山的计划。他和战士们一起，挖壕堑，背木头，扛石头，筑工事，到六十里以外的宁冈挑米上山，储备军粮，并督促地方工农兵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支前，勇敢参战。每挖完一道壕堑，每筑成一座工事，他都亲自去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命令推倒重来。他告诫大家说：现在多流汗，反“会剿”时就可以少流血，就可以更多地保存革命力量。在他的激励下，官兵们把每道壕堑和每座工事都修得固若金汤，还在五大哨口周围布上了一条十多里长的竹钉防线。为了尽最大的努力来武装部队，他下令军械处多制马刀、梭标、单响枪、五响枪，亲临军械处和工人一起拉风箱、添木炭、挥锤掌钳，加钢淬火，使工人们将制造武器视为奔赴战场，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当时，井冈山的群众看到红四军主力要转赴外地，对反“会剿”忐忑不安。他串村走寨，上门去做思想工作，用一些深入浅出的比方，解开大家心灵上的疙瘩，鼓舞了斗志，振奋了精神，使军民齐心投入反“会剿”的战斗。

进剿的敌人开始齐头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进：五百里崇山峻岭的上空，时而响起哒哒的机枪声，时而震荡隆隆的大炮声，时而敌机在空中撒下反动传单……临战气氛一分紧张，仿佛一把火就能把苍穹的空气全部点

燃。一身浩气、满脸威严的彭德怀，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冒着敌人的炮火，在阵地前沿观察敌情。他采纳了三十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王佐的建议，将二营一个连分散在山下，负责侦察敌人的行踪，然后让自己的得力助手李灿率第一大队和徐彦刚带领的莲花游击队镇守雄关险隘黄洋界哨口，将有勇有谋的贺国中派往峦蟑峻峨的桐木岭哨口，指挥第八、九两个大队；把迎难而进的彭包才点上耸入云端的八面山哨口，带领第十大队拒敌；下庄是王佐老家，则由王佐的三十二团二营扼守。他还让红军医院党支部把轻伤病员组织起来，准备在必要时刻投入战斗。

就在彭德怀调兵遣将的同时，湘敌、赣敌分别在何键、金汉鼎的驱使下来到了北面的黄洋界脚、八面山旁和东面的桐木岭下。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总攻击开始了！

守山军民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

官兵们据险而守，一分沉着，人人都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存亡的决心。三十二团二营在下庄、行州英勇抗击赣敌一个团。从永新方向攻打桐木岭哨口的敌人，一到桐木岭下，机关枪就象煮稀饭似的嘟嘟地响个不停，子弹削断了树枝，擦掉了树皮，直往哨口上守军的阵地上灌。阵地一度被陷落了！这时，白银湖、梨坪、锡坪的群众，在阵阵锣声中挥动锄头、铁铲、斧头赶来参战。贺国中趁机率部反击，把敌人打下了桐木岭。黄洋界哨口的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的敌人不是被土地雷炸得血肉横飞，就是被擂木滚石砸得尸体狼藉。每次冲锋都落得个损兵折将。八面山的撕杀更是令湘敌胆颤心惊，敌人来一批死一批。恼羞成怒之下，他们架起山炮，密密麻

麻地轰炸工事，把阵地炸得七零八落。他们轰塌一次，战士们又重修一次。1月，井冈山上天寒地冻，树上的冰凌茶碗般粗，山间的小路镜子般滑。战士们的生活极端艰苦，饭菜从15里路以外送来，冰凉于冷。最难熬的是夜间，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如浆，坐不能坐，卧不能卧，疲乏的战士一躺下，胸上积雪，背下透泥……尽管如此，官兵们仍然坚持了三天三夜。

这些日子，一直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彭德怀，更加用心紧贴着大家。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日夜来往于茨坪，下庄、行州、大小五井和五大哨口之间，一忽儿听取侦察员报告敌情，一忽儿站在阵地前眺望敌阵，一忽儿布置作战方案，一忽儿催促后勤给养……他身上的干粮袋被荆棘划破，仅有的几把米早已漏光了。然而，他毫不顾及自己，一心考虑战局，三天未吃到一口饭，三夜没合过一下眼。在他的运筹和指挥下，敌人始终难以向井冈山上挪动一步。

正当战局朝着胜利步步迈进之时，湘敌收买宁冈一个游民带路，绕过哨口的防御工事，窜进小井，屠杀红军医院的重伤病员，切断了哨口与军部的联系。守山军民陷入被敌围击的漩涡。面对强敌的逼进，彭德怀身临困境而不惧。他亲自带领军部的勤杂人员、教导队和轻伤病员，反击奔向黄洋界哨口的敌人。在离黄洋界哨口七、八里远的山头上，彭德怀和李灿各率部队夹击敌人，战斗持续整整的一天。然而终因弹尽粮绝，又缺援兵，至使被夹击之敌有得以窜上黄洋界哨口的机会。就在这时，八面山哨口又遭敌人的重炮轰击，彭包才和战士们一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各个哨口相继告急……若不

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红五军将有垒卵之危。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彭德怀遵照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事先召开过的联席会议做出的应急决议，收拢守山的部队，然后找到特委负责人简单汇报战况。特委负责人指示彭德怀率红五军迅速突围，留下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就地隐蔽，寻机再打击敌人。彭德怀在下庄率领收拢起来的一千多名指战员，护卫伤、残、病、弱人员，经河西拢向遂川大汾方向开拔。

窜进井冈山来的敌人，已经把座座山岭、条条谷壑、包围得严严实实。突围部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攀悬崖，翻峭壁，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大森林里。他们用马刀劈荆斩棘，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饿了，拨开冰雪拔把草根；渴了，抓把雪团放进嘴里。彭德怀对大家说：我们要下决心突围出去，只要大家坚强、勇敢地冲过这个难关，本军长自有办法！路上，他把自己的鞋脱下来供给伤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他用自己的心温暖着官兵的情怀。经过两天一夜，红五军终于翻越了六背坳，经上烟、长坪、樟坑、石门岭来到大盼附近的长冈坪。

然而，这里是敌人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饥寒交迫的红五军指战员们，已经精疲力尽。彭德怀指着路旁一棵傲雪而立的苍松对大家说：“我们革命的队伍，人人要象这棵松树一样，不怕日晒雨淋，不畏雪压冰冻。现在，前面就是敌人的第四道防线，我们要打垮它，摧毁它，胜利地冲过去！”在他的鼓动下，经过一场恶战，红五军终于冲破了敌围。可是，彭德怀却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打赤脚。官兵们见状，感动得眼泪盈眶他说：我们的军长啊，赤心忠胆为革命，火海刀山不回避！

彭德怀率领大家，经过四十多天艰苦的行军和战斗，

虽然全军只剩下三百多人，但依豪情似火，斗志如钢，与敌奋战。4月初，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在瑞金与红四军会合了。休整几天以后，彭德怀又遵照前委的指示，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收复失地。

春风和畅，丽日明媚。军旗下，彭德怀和官兵们迈步挺进，挑起历史赋予给自己的更繁重、更艰苦的担子……。彭德怀发银元

1929年1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突围，井冈山失守。国民党嚎叫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对井冈山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整个大小五井一带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敌人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房就烧，井冈山上触目皆是断壁残垣、尸骸遍野。国民党杀害了茨坪村几十人，屠杀了小井红军医院130余名伤病员。他们每隔三、五天轮番上山烧杀，大井村反复烧了9次，下井被烧13次，茨坪被烧7昼夜；从下庄到荆竹山50多里路范围内，所有民房化为灰烬；大小五井120多户农民被杀绝十多户。根据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9年5月，彭德怀回师井冈山，率领红五军日夜兼程，经过20多天长途跋涉，击溃反动地主武装李世连和肖家壁的靖卫团，胜利抵达井冈山，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彭军长和战士们看到茨坪一片焦土的凄惨情景，许多群众衣不遮体、食不裹腹，挣扎在死亡线上。目睹此情此景，彭军长潜然泪下，他不顾数月征战千里的劳累，立即对井冈山群众进行慰问。在红五军给养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挤出一笔银元，发给当地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五月初的一天上午，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山杜鹃花

正含苞欲放。红五军、游击队、赤卫队在茨坪北桥召开五大哨口以内的群众大会，彭军长对群众进行了亲切慰问，宣讲了红五军回井冈山的意义。会后，彭军长站在一座木桥上，代表红四军和毛委员、朱军长，向井冈山的男女老幼分发银元，一人一枚。这时，人们奔走相告，喜气洋洋。他们捧着彭军长分发的银元，激动万分，心里一片温暖。李尚发把所得的一块银元缀在儿子的风帽上，对孩子说：“孩子，记住，这块银元是红军发给咱们的，我们家要一辈子牢记红军的恩情。”现在这块银元存放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井冈山人民为了纪念红军，把水桥叫作“红军桥”。

文学家胡适出生

对于胡适这个名字，想来大家必不陌生，但对其人其事如何，想来恐怕也了解得也不多的吧？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一般是学者、作家；要不就直斥之为资产阶级走狗。却很少有人去讲他那革命性的一面，对他为中国所做的贡献、评价，也很少有从客观方面去看待的！单从《差不多先生》一文中，我们就可看出，其对中国人的了解是多么的透彻！

事实上，胡适曾倡导，并亲自赤膊上阵，为其打拼过一场惊天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整个中国命运的大革命——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他尚在美国时，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被诮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1918年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

钊等均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他创作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的口号是胡适最先提出来的。他还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白话是胡适最先倡导的，他也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打拼过！这些，大家想来都是很熟知的。可是，却很少有人能从应有的高度，真正地去理解这场革命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用文言文来编纂数学、化学、物理等教材，用之来讲授，结果会怎么样？用文言，容易讲明火箭是如何升天的吗？容易说明 dna 是什么吗？

所以说，白话运动，对把知识的普及，对开民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加速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步伐！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白话运动，使中国幸免于灭顶之灾！正是因为有了白话，才使把知识尽快，尽可能多地传给普通人成为了现实！才使知识变为了大众化的东西，不似原来的文言时代，文化，知识是精英阶层的東西！

其次废文言，倡白话后不久，中国就面临了几乎亡国的危机——日本侵华。想当初，中国能打败日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动了群众！要发动群众，拿那机械的文言文去讲行，普罗大众易于理解吗？没有白话的通俗易懂，群众能否发动起来还是未知数啊！

所以，我认为胡适所倡导的白话运动，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影响！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最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在他勤奋的一生中，曾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

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士、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纵观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史学界乃至政治界，胡适对其均有重要影响。

一般的人对胡适先生的早期文学活动知之甚详，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胡适形象已被遮掩，他对自由主义的不倦追求日益模糊。现在谈论胡适，其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与精神方面，而非文艺与学术方面。虽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已无须置辩。

不过，从大的方面归纳来看，胡适一生的事业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与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里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另一个方面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的一生，特别是在晚期，为实现这而已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晚期的思想更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一生为自由与民主而呐喊的胡适本色。

他所奋力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民主运动，实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份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贬者还是赞者，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胡适早已远去，却留下了他的文章、他的思想让后来人仔仔细细地打量。但我们能否从他的宝贵财富中得到营养呢？思之有些彷徨。但愿前行者的足迹不会很快就消失，殷勤祝：后来者。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

只在于它的物质力量，而更在于它的精神力量，在于它能否存在着一个包容一切的完整思想体系。在这种意义上说，胡适的价值是我们永远的精神之源。

胡适原名嗣糜，学名洪骅，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 1891 年 2 月 17 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 年 2 月 24 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 72。

胡适 5 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 9 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 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 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 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 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

“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

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在中国提倡人权的，胡适是较早的一个。他也有一套人权思想。

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革新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世所公认。他关于当时中国的重大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问题的自由主义观点无不具有开风气招榛莽的作用。他的自由主义人权观是本世纪上半叶人权思潮的最高峰。他在《新月》杂志上掀起的人权问题讨论成为本世纪几次人权讨论热潮中最引人注目、最具有理论意义的一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旗手。由严复所引发、由陈独秀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路线终于在胡适这里趋于成熟，待到完成。如果说严复和陈独秀在倡导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同时，曾经都在不同程度上在理论基点上发生过动摇，出现过游离和徘徊，那么胡适在人权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始终如一，毫无保留。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从未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意识，而是被夹在国共两党的铁钳之间苟延生息，尽管胡适后期投靠国民党，放弃了自由主义知识人的独立立场，但其思想的自由主义基点并未因之变化。胡适个人是失败了，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潮也未成功。但这一切都只是开始，不过是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悲壮的一幕。其中的伏笔所预示的新的最高潮还未来临。笔者相信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中，终将会看到自由主义人权思潮的奉献。正是在这一点上，研究胡适的人权思想就不能只是记录其思想的历程了。再现胡适人权思想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思想记录本身。胡适人权思想的生命历程应在跨世纪之际得到复活，并将在下个世纪放出褶褶光辉。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倡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这是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认识。易卜生曾经表示，国家的观念终将消灭，人种观念终将兴起。胡适以此推断易卜生晚年一定进入“世界主义”的境界。这说明易卜生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

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胡适宣扬个人主义也是为了铲除国家主义。个人在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后就会产生同国家的恶势力相

抗争的勇气。胡适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斯铎曼医生那样，努力铸造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国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压迫自由人权的行爲辩护。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生物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义者和一切奴役主义者的一贯作法。根据他们的逻辑，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他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人在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胡适希望看到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即敢于同腐败势力抗争的“分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胡适的个人主义和

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是同国家主义相对立的，而且是与狭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他努力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便是对当时民族主义的冲击。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他看来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便是充满自由独立和平等精神的文明，是允许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的文明。国民党在 1927 年政变以后日益转向一种保守的文化，提倡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对此，胡适指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会有一点保守性，往往走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国民党提倡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是为了禁锢思想，重新实行思想文化的专制和统一的局面。胡适倡导彻底开放的文化观则是为了解放思想，实现思想的自由和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倡导独立自由人格的个人主义是为造就负责的个人，个人对人类来说，毕竟是“小我”。这种“小我”最终是会死灭的。而人类则是“大我”，“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适主张的个人主义是“对于大我负责任”的个人主义。个人必须对人类社会负责。“这种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明确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小我要成为不朽就必须在大我身上留下影响。小我必须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必须具备勇于承担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重任，小我应当通过自己负责的言行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世界的关键在众小我的手中。这种提倡充分发挥小我作用的具有责任精神的个人主义正

是胡适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合理的个人主义”。可以说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使胡适终生受益。这种“真正的和纯粹的个人主义”构成胡适自由主义人权观的重要理论渊源。它为胡适研究一切政治和文化问题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胡适一生中影响时人的有光彩的思想言论大多都渊源于个人主义。特别是在《新月》人权运动时期。他对人权与约法问题的阐述，他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论和军训宪三段论的指责和抨击以及他对共产党人阶级专政理论的嘲讽和反对，都表明其主张的背后个人主义在起重要作用。

胡适于1929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掀起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关于人权问题的一次最深入、最具理论价值的讨论热潮。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权的概念、性质、范畴以及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政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场人权讨论虽然起因于对国民党政府反对人权行为的斗争，但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发起人胡适的预料，实际上发展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权启蒙运动。在此以前，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中系统了解人权者甚少，群众普遍缺乏人权知识。通过这场讨论、鬻适、梁实秋、特别是罗隆基，以通俗的解说将人权知识推向社会，对于增强国人的的人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的人权意识在中国思想界达到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人权意识日趋淡薄。到“文化大革命”时人权意识已被专政意识压迫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也未恢复原貌。

胡适的人权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主张人权；二是提倡法治。正如其《人权与约法》一文标题所

表明,以法治保人权可以说是胡适人权思想的全部主张。人权与法治,这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可以说它仍将是下个世纪中国社会进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大题,这是胡适对中国社会问题长期思索寻求出路的结果。早在1918年的《归国杂感》中,胡适就无比失望地怨恨道:在中国,“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全面严重的:人身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等等一切自由和权利都被黑暗的社会所剥夺。更有甚者,侵害权的理由往往是堂而皇之的服从多数的“公论”。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是不错的。于是,多数人便可以随意剥夺要求社会改革的少数人的权利。“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胡适所揭示的这种多数人任意剥夺少数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现像的确是国民意识中的深层次问题。从民国成立以来,以多灵敏人的专政为借口,凡是被认定为专政对象的“反革命分子”、“敌人”、“反动分子”等,其人权公然可以被肆意践踏。不给专政对象以人权。这种残无人道的野蛮意识在中国始终横行无阻。这是中国社会践踏人权的真正深层次问题。在当时的诸多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适看穿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主张同当时国共两党的主张有根本的区别。

从国民党的统治意识方面来看,“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动’

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意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只要将“反动分子”“反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扣在谁的头上，谁的人权便随之丧失殆尽。这种肆意剥夺人权的做法虽然引起共产党人和广大社会进步人士的不满，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像胡适这样触及统治意识的深层问题，在反对国民党专政的人们当中，许多人的专政意识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所呼唤的只是将专政换个招牌，以新专政代替旧专政。胡适对这种新的专政意识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1926年他在访问苏联后不久给徐志摩写信说：“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时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按中国。这样的捷径是不可妄想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新的专政意识和旧的专政意识的共同之处都是不容人权，不讲法治。统治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是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的统治意识的共同之处。其中根本没有独立思想的存在余地。胡适不仅对国两党的统治意识和统治主张表示反对，而且对两党的协作所带来的局面表示担忧，国民党从一开始打着孙中山的思想招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它要求人们在思想和政治上都与孙中山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共产党对孙中山也不批评，孙中山崇拜热成为国民党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对此，胡适以充满忧虑的心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礼教，否认上帝，

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现在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心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这种专制主义状况同几十年后共产党统治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是完全一样的。思想言论自由一旦丧失，个人人权乃至民族、国家的前途也都会随之葬送。胡适对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刻认识 and 先见之明，完全得益于他的自由主义和人权主义的立场。

国民党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孙中山思想中的独裁主义成分不是毫无关系的。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宪政三段论将立宪和法治一再推迟，将国民素质和提高过程同宪法治的实施过程完全分离开来。这种过程分离论在本质上起到维护一党专政和独裁的作用。对于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成份，胡适最早产生疑问。胡适以勇敢挑战的姿态指出：“我们要问，宪法与训政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胡适批评孙中山晚年“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实际上孙中山晚年不仅怀疑民众的参政能力，而且以民权幌子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从思想深处转向独裁主义。在宪政法治外空谈民权，离个人人权而言记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孙中山学说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许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胡适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提出挑战。

除了对国民党政策和孙中山学说不满外，直接引起胡适大声疾呼人权和法治的导火线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

一是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该安提醒人们警惕“反革命”活动，并将“一切反对三民主义的人”视为“反革命分子”。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证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之。”陈德征的这一提案为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提案激怒了胡适。他看到提案后忍不住给当时任司法院长的王宠惠写信，问他对此提案有何感想。在这封公开信里，胡适对国民党破坏法律程序和根本否认法治的现象提出了抗议。他责问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将此信稿送国闻通讯社发表。但几天后得知信稿已被检查新闻的官员扣去，未能刊出。这就更加激怒了胡适。他愤怒地表示：“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陈德征知道胡适批评他的提案后，很快写了一首气焰更加猖狂的打油诗登在《民国日报》上。此诗题目为“胡说”，一语双关地直接针对胡适的姓名和主张而来。诗的前几句警告胡适：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

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已堕落到何种程度。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行为，胡适忍无可忍，不得不起而大声反抗。

另一件引起胡适写《人权与约法》的事件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保障人权令。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规定：“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实际上“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乘”，竟然还会出现所谓保障人权令。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极大讽刺。胡适细读此令后感觉到更加失望。他指出此令的缺点如下：一是此令认为人权就是“身体、自由、财产”三项，并且对这三项权利都未作明确规定，自由和财产都包括什么内容，如何受保障等问题都不清楚。二是此令将侵权行为主体仅限于“个人或团体”，而对党与政府只字不提。这就为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留有余地。对此，胡适明确指出：“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三是此令所谓“依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对此，胡适指出：“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总之，国民党政府的人权保障令无非是欺人之举欺人之谈。

在国民党政府人权保障令颁发前后，发生了一系列

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这些事件也是激起胡适愤怒抨击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的缘由。一是安徽大学学长被禁案。该学长只因语言顶撞了蒋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二是唐山商人杨润普被军队拷打案。杨被当地驻军拘去拷打，遍体鳞伤，商会代表集体求情也无效。此事还是在国民党政府公布人权保障令后十一天后发生的。这两件事表明，上至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驻军军管，随意侵害人权，何尝受到法律制裁。

面对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通过对上述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事件的揭露和分析，胡适指出人权的保障与实行法治是分不开的。没有法治没有宪政，保障人权只会流于空谈。什么是法治呢？“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上至政府主席下至地方军官都不得违反法律。实行法治的前提首先是要有一部保障人权的宪法，并且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违者必须受到制裁。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借口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迟迟不愿制定保障人权的宪法。对此，胡适气愤地指斥：“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的基础。”国民党政府的人权保障令不过是一纸空文，欲盖弥彰，更加说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权根本没有保障。在胡适看来，如果真正要保障人权，如果真正要确立法治基础，就应该首先制定一部宪法，一部意在保障人权的宪法。至少也应该有一个约法。

它一方面规定保障人民的人权，另一方面规定政府的统治权限。是超过法定权限的行为，凡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何人所为，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的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胡适提出的这两句口号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反响。社会上要求立宪和重视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此呼声置之不理，甚至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迫害，但是胡适对人权法治的倡导的确定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有力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动。胡适本人也因此遭到迫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曾以颠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适。由于胡适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免遭逮捕。但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因胡被罢免。《新月》杂志也遭查禁。

在人权理论方面，胡适没有像罗隆基那样作过系统深入的专门性研究。但他在一些政论和散文中所流露出的平易通俗的人权观念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长久的影响。特别是他一贯倡导的思想言论自由以及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和批判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强权和专制面前，胡适是从不屈服的。对国民党当局，他敢于针锋相对，对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他敢于据理剖析；对独裁者蒋介石，他要求诉诸法庭明辩是非；对社会上种种落后思想和习惯势力，他敢于冒犯众怒鞭挞群愚；对时人盲目崇拜的各种“革命”新潮，他敢于独树一帜，逆流勇进。总之，胡适以他特有的人格和风貌充分展示出追求自由人权的不倦精神。

胡适的人权思想如同他的散文风格一样严实晓畅。且在浅显明白的背后，涌动着一股深藏不露的坚实稳固的精神。这就是和平抵制主义的精神。他的自由主义人

权思想充满着理性与平和的色彩。他对暴力革命始终持坚决反对态度。他断定：“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控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胡适痛斥旧社会的罪恶。并致力于呼唤改造旧世界。但他认定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呼唤民众和平抵制。他毕生从事的伟业便是催发思想的觉醒和抵制专横的压迫。他选择的道路虽然在现实中充满荆棘且最终被内战和革命打断进程。但他深信不疑终生信守的科学批判精神及其文章中焕发的理性之光，对于后世社会思想的进步，不无启迪意义。只要人类追求自由人权的事业一日不中断，胡适人权思想中的和平抵制主义精神便一日会有其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只要人类没有深陷暴力和专横之中不能自拔，胡适倡导的科学批判精神就会重新对社会文明进步产生推动作用。

雷锋同志因公殉职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湖南望城县人。1949年参加儿童团，担任儿童团长。1954年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1956年在乡人民政府当通讯员。不久，调到中共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曾参加洩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钢的建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时，

他把自己在工厂和部队积存的 100 元钱捐献给公社。当他得知辽阳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时，又将 100 元寄给了辽阳市委。他还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担任驻地附近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在入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荣获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出席过沈阳部队共青团代表会议。1961 年升为班长，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 年 8 月 15 日因公殉职。1963 年 1 月 7 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同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小资料

2 月初 刘少奇主席召集林业部副部长惠中权等人汇报橡子资源和利用情况，并责成林业部试验研究利用橡子养猪以节约粮食问题。

2 月 17 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荒、挖矿、修筑水利和交通工程应注意水土保持的通知》，严禁破坏森林和牧场；严禁乱垦乱牧。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固沙林、大水库周围和大江河及其主要支流两岸规定范围以内的森林，山区和水土流失地区铁路两侧的森林，一般规定为禁垦区，并应造林护岸和防沙。

6 月 7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南方五省区林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南方五省（区）调查组《关于福建等五省（区）的林业情况和八项建议的报告》。

8月22日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毁林开荒、陡坡开荒。

9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关于充分利用木材资源、大力开展木材的节约代用工作的报告》。

9月14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

11月2日 周恩来总理指示：“林业的经营要合理采伐，采育结合，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1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成立东北林业总局的决定》。

世界部分

世纪回眸

《寂静的春天》的首次出版发行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你若有心去翻阅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

了一盏明亮的灯。

由《寂静的春天》引发的这场杀虫剂之争已过去 35 年了；当尘埃落定之后，许多问题变得明澈。第一，虽然 DDT 和其他剧毒农药已被禁产、禁用，但化学工业并未因此而垮台，农业也未因此而被害虫扫荡殆尽；相反，新型的低毒高效农药迅速发展起来，化工和农业在一个更高的、更安全的水平上继续发展。当环境保护刚起步之时，我们常在“要环保，还是要经济发展”的质问面前犹豫。在“经济-环保”这一矛盾面前，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才能扭转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寂静的春天》及其后的一段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第二，虽然卡逊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虽然一些剧毒农药被禁了，虽然尔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被实施了，但我们的环境在整体上仍继续恶化。每年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比解决的多，环境危害正由局部向大区域甚至全球扩展。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环境问题仅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的人类社会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社会结构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如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推动了许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正在上升为导引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矛盾。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安全的食物和与之共存共荣的多样化生物基因，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社会组织还有什么功效呢？20 世纪后

半叶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突飞猛进的时代。在这个小小的蔚蓝色地球上所出现的新思考中，全球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最具根本性的。一个正确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如今，卡逊的思想正在变成亿万人的共同意识，这一新意识的觉醒正为人类社会向新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世界各国虽国情不同，但面对这一跨世纪改革时的痛苦思考是共同的。中国，由于她特定的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条件，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会显得更加严峻。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中国有希望成为一片文明昌盛的人间乐土，若解决得不好，中华民族将会经历更深更苦的磨难。这是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关切和忧虑。

世界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但有关调查却显示，人们公众和学界的环境意识均非常欠缺。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世界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其中许多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震动，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有些甚至被誉为“绿色圣经”。

正是这些书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国际性环境保护机构和组织的酝酿成立及国际性环境保护运动的

风起云涌，也在一定意义上延缓了某些环境劫难的发生时间……

然而在我国，这些著作有的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有的虽然有中译本出版，但无声无息，影响很小；有的虽然翻译出版之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给读者展开一个绿色的视野。《绿色经典文库》郑重征购版权，将这些久负盛名的绿色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

现在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尽管历时不长，但也涌现了不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绿色经典文库》精选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以记录绿色精神在我国的成长历程。我们希望，这些绿色读本的系统出版能够形成一股绿色冲击力，增进和深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我们也希望，《绿色经典文库》能够成为一个绿色思想库，使中国的学界在消化吸收绿色观念方面有第一手的基本文献可以依靠。诚望各界有识之士对选题和译本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出好这套文库，共同为中国的绿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副总统阿尔·戈尔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

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

DDT 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 1992 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颂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

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语气傲慢、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 DDT 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最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包括看过报纸和电视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了 50 万册时，CBS 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

肯尼迪总统曾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调查它的观点。这个专门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是对一些企业和官僚的熟视无睹的起诉，卡逊的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不久以后，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 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着我，使我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的，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公司在卡逊的整个论战过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好名声，出版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险的好书。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领导人——那些总

统们和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它已经在那里许多年了，它属于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又是个孤独的听众，官场的人们常常难以如此。当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哈金丝的妇女的关于 DDT 杀死鸟类的信时，她就构思出了《寂静的春天》。现在，因为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 DDT，一些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鸟类，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迹的边缘。因为她的著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哈丽特·贝切尔；斯托把人们熟知的。公众争论的焦点写成了小说；她给国家利益和大众关怀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绘的奴隶的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战争处于高潮时会见了她，对她说：“您就是启始整个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尔·卡逊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 1963 年在国会作证时，参议员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 Ribicof)欢迎她时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寂静的春天》与现实持续不断地相关联。奴隶制可以，也确实在几年内终结了，尽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去处理它带来的后果。

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依靠笔端的斗争而废除，化学污染却不能。尽管卡逊的论辞铿锵有力，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 DDT 的行动，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 11 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 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卡逊的很少的几次演讲的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 (GardenClubofAmerica) 作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问题很多，却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我们正遭受着暴露的化学药品的全面污染。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它们极具毒性，很多情况下它们的效果还会积累。这种侵害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法，这种侵害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已经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猛增。难办的是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 (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 于 1970 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 (FoodSafetyinspectionService) 都从农业部移到了新

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 1962 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

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 70 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 DDT 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 5 至 10 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

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的、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 22 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预测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论时，她谴责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并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举个特殊的例子）化工工业可以在捐款上讨价以反对未来的管制。……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种努力的持续几年的失败可以解释另外一种失败，结果会同它们不可接受一样不可否定。1992 年，我们国家共用了 22 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 8 磅。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杀虫剂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则可以毒杀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这对人也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有卡逊所描述的日用化学品的值得怀疑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一种蜡刨光地板，它可以杀死上面的虫子”，现在有超过 90 万个农场和 6900 个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而150万磅流入供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阿特拉津并没有在市政的水处理过程中提取出来。春天来临的时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国真正被禁用了。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而且还在增加。来自苏格兰、密执安、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仅在美国，在此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已下降了50%。

有的文献认为这些化学药品也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环境健康服务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ervices）中的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新政府建议进行这种检测。

这些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无疑会做出传统的回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疾病有直接联系，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虽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谨慎的，而不是鲁莽的决定），而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并不

总是绝对地、必然地等效于人体实验。这些回答令我们想起了卡逊当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化学工业和大学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回应。她预料到这种回答，在《寂静的春天》中她这样写道，“少吃一点半真半假的镇静药。我们迫切地需要给这些错误的断言和文过饰非画上句号。”

在 80 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掌管内政部、安·戈萨奇（Ann Gorsuch）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历史潮流。政府采取了三项硬性措施：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大部分用生物制剂代替。

显而易见，合理使用杀虫剂不得不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码排除在标准。平衡之外，标准必须是明确的、严格的，检查必须彻底、真实。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孩子规定的对农药残余物的忍耐水平超过了他们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计算经济效益才能为之辩护呢？我们必须检查化学药品对孩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人。同时，我们不得不检验一定范围化学品的不同组合。我们必须检查，不仅为了减少恐惧，也为了减少我们不得不恐惧的东西。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暂时

的或投机的。

总之，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这也许是工业界和政治辩护士所敌视的。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学药品控制昆虫的替代品”。今天，这些替代品很广泛，尽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推广无毒物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杀虫剂生产和农业集团与公众健康团体之间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桥梁。两个团体中的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充满怀疑和敌视，而不彼此正视，我们就会发现改变一个其产品和利润以污染为代价的体制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够结束这种体制的有效方法是缩小文化界限，让农业附属机构鼓励替代化学药品。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对话，让为我们提供食品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两个集团彼此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 1952 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不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 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 50 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诫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

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寂静的春天》于1972年-1977年间陆续译为中文，开首的几章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环境地质与健康”上登载过，全书于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年后的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国盛先生及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协同努力下，这本书得以纳入《绿色经典文库》再版。我们衷心希望，这本彪炳史册的著作作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带来的启迪和推动，能够继续下去。

西萨摩亚独立

西萨摩亚以“玻利尼亚文明的发源地”著称。1962年脱离新西兰独立。居民以毛利人为主。在该国的众多

岛屿中，只有四个岛上有人居住。该国经济主要得益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农产品，如香蕉、可可和椰子的出口仍是该国收入的来源。

西萨摩亚国徽是一个用红线勾勒出的地球，赤道横穿地球中部，正中是由椰树和南十字星座图案构成的盾徽。蓝色波纹线代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重叠的绿色山丘和白色天空代表岛国西萨摩亚，绿色的椰树代表上帝所赐的万物生灵。国徽顶部矗立着一枚闪闪发光的红边蓝色十字架，象征宗教的力量超越宇宙万物，超越天空、陆地和海洋。国徽基部的饰带上写着“上帝为我们创建西萨摩亚”，显示了西萨摩亚人对上帝的无比尊崇和虔诚，他们相信，是上帝为他们带来了这无比珍贵的自由。教皇若望二十三世革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教籍

美洲国家组织革除古巴

1962年1月22~30日，第8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以“任何成员国信奉马列主义同泛美体系不相容”为由，以勉强的三分之二多数（古巴反对，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和玻利瓦尔弃权）通过关于将古巴政府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停止同古进行一切武器和军事装备贸易的决议。

美洲国家组织的前身是“美洲大陆共和国联盟”。1889年10月~1890年4月，美国同拉美17国在华盛顿举行第1次美洲国际会议，4月14日建立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后来，4月14日定为“泛美日”。1901年10月~1902年1月，第二次美洲国际会议在墨西哥召开，提出改组“商务局”。

191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4次会议上，把“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改名为“美洲共和国联盟”，把“商务局”改名为“泛美联盟”。1945年3月，在《联合国宪章》签署之前，美洲21国在墨西哥举行的泛美会议决定改组和建立一个美洲区域性组织。1948年在波哥大举行的第9次会议上，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改称为“美洲国家组织”。1967年第3次泛美特别会议通过了《宪章》的修改议定书，1970年2月27日生效。议定书规定以“美洲国家大会”取代“美洲国际会议”，会期由原每5年举行一次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常设机构改称“秘书处”。

加强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保障成员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在成员国遭到侵略时，组织声援行动；谋求解决成员国间的政治、经济、法律问题，促进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合作；控制常规武器；加速美洲国家一体化进程。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规定，凡批准该宪章的美洲国家都可成为成员国。目前，所有美洲国家都是成员国，共35个：阿根廷、安提瓜和巴布达(1981)、巴巴多斯(1967)、巴哈马(1982)、巴拉圭、巴拿马、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克(1979)、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哥斯黎达加、格林纳达(1975)、海地、洪都拉斯、加拿大(1990)、美国、墨西哥、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圣卢西亚(1979)、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81)、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1984)、苏里南(1977)、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7)、危地马拉、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1969)、智利、圭亚那(1991)、伯利兹(1991)，古巴(自1962年一直被拒绝参加该组织的活动)。(注：

括号内为加入日期。)

目前,共有 56 个国家或组织向美洲国家组织派观察员:西班牙、以色列、荷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日本、葡萄牙、埃及、奥地利、梵蒂冈、瑞士、希腊、沙特阿拉伯、韩国、摩洛哥、塞浦路斯、赤道几内亚、阿乐几利亚、芬兰、巴基斯坦、欧盟、突尼斯、匈牙利、罗马尼亚、印度、波兰、安哥拉、俄罗斯、乌克兰、黎巴嫩、克罗地亚、捷克、英国、波黑、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瑞典、加纳、保加利亚、也门、泰国、土耳其、菲律宾、爱尔兰、丹麦、挪威、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黑山、卡塔尔。此外,该组织还视具体情况,邀请一些国家作为特别观察员,出席全体会议。

观察员地位是美洲国家组织全体大会在 1971 年通过决议正式设立的。须获常设理事会一致通过。常驻观察员有权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的任何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也可应邀参加秘密会议;有权获得该组织所有公开散发的文件。不须交会费,但有义务表明愿参加该组织主办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1、大会:最高机构。各成员国参加,每年举行一次。经三分之二成员国同意,可召开特别大会。

2、外长协商会议:系依据《泛美互助条约》正式设置的。经常设理事会绝对多数票赞成即可召集会议,就共同关心的紧急问题进行协商。如涉及军事合作问题,则同时召集由各成员国最高军事当局代表参加的防务咨询委员会会议。

3、大会直属机构:(1)常设理事会,由成员国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组成。正、副主席由各国代表轮流担任,

任期半年；(2) 泛美一体化发展理事会，1996 年成立，取代原有的泛美经社理事会和泛美教科文理事会，由成员国各派一名部级代表组成。

4、咨询机构：泛美法律委员会、泛美人权委员会。

5、秘书处：常设机构。受大会、外长协商会议和两理事会领导和监督。正、副秘书长均由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只能连任一次。

6、专门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泛美卫生组织、泛美儿童学会、泛美妇女委员会、泛美史地学会、泛美印第安人学会、泛美农业合作学会、泛美控制毒品委员会、泛美通讯委员会。此外，还有泛美人权法院、泛美防务委员会、泛美统计局、泛美行政管理学院、泛美核能学会、泛美紧急基金等。

1975 年 5 月 17 日，阿根廷人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Alejandro Orfila)当选为秘书长，同年 7 月 7 日就职。1984 年 3 月，巴西人若昂·克莱门特·巴埃纳·苏亚雷斯(João Clemente Baena Soares)当选秘书长，1988 年 11 月连任，1994 年 6 月 15 日卸任，副秘书长托马斯临时接任。现任秘书长为哥伦比亚前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César Gaviria)，1994 年 3 月 27 日当选，9 月 15 日上任，1999 年 6 月 8 日连选连任。

设在华盛顿。在日内瓦设有驻欧洲办事处，在各成员国设有办事机构。

1889 年 10 月 2 日~1890 年 4 月 19 日，在华盛顿召开第 1 次美洲国际会议，建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并决定在华盛顿设“美洲共和国商务局”。

1901 年 10 月 22 日~1902 年 1 月 22 日，在墨西哥举行第 2 次美洲国际会议，提出改变由美国独掌“商务

局”的状况，成立由驻美国的各成员国外交代表和美国一名代表共同组成的领导理事会。

1906年7月21日~8月26日，在里约举行第3次国际会议，决定将“商务局”的职责扩大到文化合作方面。

1910年7月12日~8月3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第4次美洲国际会议，成立“美洲共和国联盟”，并将“商务局”改名为“泛美联盟”。

1923年3月25日~5月13日，在圣地亚哥举行了第5次美洲国际会议，签订了“美洲国家间防止冲突条约”，即“贡德拉协约”。

1928年1月16日~2月20日，在哈瓦那举行第6次美洲国际会议。

1928年12月10日~1929年1月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美洲国际调解和仲裁会议，签订了泛美调解总协议和泛美仲裁总条约。

1933年12月3~23日，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第7次美洲国际会议，通过了有关各国的义务和权利的协约，打下了不干涉原则的基础。

193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泛美巩固和平会议，确定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和威胁到美洲共和国的战争的原则，签订了对不干涉原则的附加议定书。

1938年12月9~27日，在利马举行了第8次美洲国际会议，发表了《利马宣言》，重申共同对付一切外来的干涉和侵略，建立了“外长会议”制度。

1939年9月23日~10月3日，第1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在巴拿马城举行，宣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半球中立。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有：《美洲各共和国一

般中立宣言》，《巴拿马宣言》以及成立美洲国家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决议等。

194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了泛美战争与和平问题会议，决定改组、巩固和加强泛美体系，建立泛美经社理事会，同时签订查普尔特佩克会议纪要，即关于本大陆的互助和团结的决定。会议并决定改组和建立一个美洲区域性组织。

1947年，在里约举行泛美维持本洲和平与安全会议，签订了“泛美互助条约”（又称“里约条约”），即美洲国家的集体安全条约。该条约于1948年12月30日生效。

1948年3月30日~5月2日，在波哥大举行第9次美洲国际会议，签署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巩固了泛美体系结构，并签订了“美洲和平解决争端条约”（即波哥大条约）。

1951年第4次外长协商会议讨论了“国际共产主义扩张政策对本大陆和平的威胁”。

1954年3月1~30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第10次泛美会议，把“美洲国际会议”改名为“泛美会议”，通过了《维护美洲国家政治完整、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团结宣言》，决定配合美国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

1961年，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经社理事会特别会议签署了《埃斯特角宪章》，决定建立“争取进步联盟”和吸收本大陆内外资本输出国家的资金和进行技术合作，推动拉美国家的发展。制定了特别培训计划和技术合作统一计划。前者主要是指在美洲以外的国家培养成员国社会和经济所需科技和专业人员，包括住房、土改和发展合作社等方面的人员。后者是指将该

组织以外国家的技术援助和培训直接邀请到拉美来进行。

1962年1月22~30日,第8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以“任何成员国信奉马列主义同泛美体系不相容”为由,以勉强的三分之二多数(古巴反对,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和玻利瓦尔弃权)通过关于将古巴政府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停止同古进行一切武器和军事装备贸易的决议。

1964年第9次外长协商会议要求成员国断绝同古巴的外交、领事、贸易关系。

1964年12月16~18日,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泛美特别会议,讨论接受新成员国的原则。

1965年第10次外长协商会议决定组织派赴多米尼加的“泛美和平部队”,使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合法化。11月17~30日,在里约举行第二次泛美特别会议,决定根据美洲各国人民的需要和现实修改组织的宪章和结构。

1967年2月20~27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第3次泛美特别会议,通过了修改宪章的议定书,又称“布宜诺斯艾利斯议定书”,增加了“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内容,1970年经三分之二成员国批准生效。议定书提出以全体大会代替泛美会议,作为组织的最高机关,每年召开一次,以便及时解决本地区问题。

1969年,21个拉美国家召开特别协调委员会,通过了《拉美协调一致宪章》(《比尼亚德尔马文件》),要求对“拉美同美国贸易关系”进行“深刻变革”,并以此文件作为在泛美经社理事会上同美国讨论的基础。

1970年6月25日~7月8日,在华盛顿举行大会,

讨论防止“恐怖”和绑架活动，通过了“谴责恐怖活动”的决议。

1971年在第14次外长协商会议上，拉美国家一致投票支持厄瓜多尔控告美国侵犯厄200海里领海权的提案。9月，21个拉美国家发表了维护拉美国家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拉丁美洲宣言》。

1971年4月~1974年4月，第1~4届大会分别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华盛顿、华盛顿和佐治亚州举行，讨论通过的主要问题有：关于防止和惩办恐怖主义行动协约；扩大贸易；对待保护主义的立场；建立常驻观察员；强调严守各国人民自主和不干涉原则；建立研究改革泛美体系的专门委员会等。

1975年1月，常设理事会通过决议，反对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歧视性条款。5月，第5届大会在华盛顿召开，讨论改革泛美体系和归还巴拿马运河，决定修改《宪章》和《泛美互助条约》，并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取消其贸易法中把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石油出口国排除在普遍优惠制之外的条款。大会还讨论了智利的人权问题和古巴问题。7月，召开了修改《泛美互助条约》的特别大会，通过《圣约瑟议定书》，在条约中增加了“政治多样化”、“集体经济安全”、反对“经济侵略”等原则。美对“集体经济安全”原则投了反对票。会后，又立即召开了第16次外长协商会议，按照修改后的《泛美互助条约》，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了墨西哥等国提案，授权各成员国以各自认为适当的级别和方式处理同古关系。12月，常设理事会通过秘鲁提案，撤销1962年为对付“共产主义对西半球的威胁”而成立的安全协商特别委员会。

1976年1月，常设理事会以大多数票通过了《宪章》

修改草案，但由于美国的反对，未能召开特别大会进行讨论。6月在圣地亚哥召开了第6届大会，讨论了人权问题，抨击苏、古武装干涉安哥拉，探讨保障拉美地区安全的途径。大会还讨论了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等国提出的要求美国取消其进口拉美商品的限制和歧视以及修改外贸法的提案。

1977年6月在格林纳达圣乔治召开第7届大会，以14票赞成、8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西半球人权问题的提案，一致通过了人权问题应同西半球国家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提案。还通过了反对美国增加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的提案。在第5、6、7届大会上，拉美国家都表示支持巴拿马收复运河的要求。

1978年6月，第8届大会在华盛顿召开。美国总统卡特在开幕式上表示，美国同巴拿马签定的运河区新条约是“泛美谅解新世纪的开始”，今后美将致力于解决拉美国家的双边纠纷，并对“外国军事力量介入地区性争端”表示不安。大会通过了有关跨国公司行为准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

1979年6月，在外长协商会议上，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议，要求在尼加拉瓜建立过渡性民主政权以取代索摩查政权。同年11月，在第9届大会上，美国务卿万斯在会上表示美洲国家组织应以加强美洲的和平结构为第一目标。会议通过了抨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拉巴斯宣言》，重申不干涉原则、政治多样化、建立民主政体，强调防止“大国间的紧张中心扩散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要求成员国取消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和破坏原料价格稳定的措施。

1980年10月，在该组织参与下，洪都拉斯、萨尔

瓦多签署了解决边界纠纷的“和平总条约”。11月在华盛顿召开第10届大会,阿根廷等国强烈批评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大会通过了谴责玻利维亚军事政变的决议。

1981年2月,召开第19次外长协商会议,通过了要求秘鲁、厄瓜多尔停止边界武装冲突的决议,并决定由阿根廷、巴西、智利、美国组成4国委员会进行调停。12月,在圣卢西亚召开的第11届大会上讨论了中美洲局势,通过了有关萨尔瓦多问题的决议,重申只有萨人民有权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

1982年2月,美国总统里根在常设理事会上宣布美国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的援助计划(又称加勒比盆地倡议),主要包括美对该地区向美出口的产品(纺织品、服装除外;糖有限额)免征关税12年;追加3.5亿美元紧急援助;采取措施鼓励美私人向该地区投资等。4月26日和5月27日,就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冲突,先后召开第20次外长协商会议。会议第一阶段通过9点决议,主要内容为:敦促英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敦促英、阿立即宣布停火,以便在考虑到阿对马岛主权权利和该岛居民利益的情况下,继续谈判,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等。第二阶段通过了谴责英对阿的进攻,要求美国和欧共停止对阿的制裁等决议。11月,巴哈马外长保罗·劳伦斯·阿德利在《泛美互助条约》上签字,巴成为第22个缔约国。同月,在华盛顿召开第12届大会,通过了关于要求阿根廷与英国和平解决马岛争端、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等60个决议。大会还认论了中美洲局势,但未做出任何决议。

1983年7月,应洪都拉斯的要求,常设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洪、尼两国关系。10月,特别会议讨论

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边界冲突问题。11月，第13届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各国代表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会议还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中美洲和平所作的努力，并一致赞同解决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的议案。秘书长奥尔菲拉提出辞职。

1984年3月，接纳圣基茨和尼维斯为新成员国。同年11月，第14届大会通过了《巴西利亚宣言》，强调代议制民主对本半球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充分肯定了拉美民主化进程，并要求所有国家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努力。

1985年3月，常设理事会应阿根廷要求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谴责英国在马岛建立军事设施，再次呼吁和平解决马岛争端。6月，特别会议决定由孔塔多拉集团4国代表与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共同调查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边境冲突事件。12月2~5日，第14届特别大会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举行，会议通过了对《美洲国家宪章》中的某些条款作重要修改的“卡塔赫纳协议”，讨论了中美洲局势和外债问题，达成了争取实现中美洲和平的“共同行动协议”。同月5~9日，第1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中美洲和平，谈判解决马岛争端，合理解决玻利维亚出海口等问题的决议和《美洲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

1986年5月，常设理事会决定将7月24日定为“西蒙·博利瓦尔日”。11月10~15日第16届大会在危地马拉城举行，讨论了中美洲危机、外债、毒品走私和英国10月29日单方面宣布马岛周围150海里为专属捕鱼区之后的马岛地区形势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1987年1月，秘书长苏亚雷斯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

利亚尔，同“孔团”和“支持集团”的八国外长组成“十人和平使团”，访问中美洲五国，呼吁早日实现中美洲和平。11月9~14日在华盛顿举行第17届大会，多数成员国批评美国的中美洲政策，但未能就中美洲问题通过任何决议。

1988年11月14~19日第18届大会在圣萨尔瓦多举行，讨论了拉美国家的外债、中美洲危机、反贩毒以及拉美国家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会议仅通过使1985年签署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生效的协议。

1989年5月、7月、8月分别召开外长会议，讨论巴拿马局势，反对外国进行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10月，美洲国家领导人利用纪念哥斯达黎加实行民主100周年之机，在哥首都举行会议，加拿大宣布决定加入美洲国家组织。11月13~18日第19届大会在华盛顿举行，强调民主和人权是该组织今后10年的两大主要目标，通过决议谴责巴拿马“严重侵犯人权”，决定加拿大从1990年1月起成为成员国，美国在此次大会上，反对让古巴重返美洲国家组织。12月，常设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对美入侵巴拿马“深表痛惜”，呼吁美撤军。

1990年6月4~8日，第20届大会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行。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苏里南和巴拉圭6国总统出席并签署了纪念美洲国家组织成立100周年的《百年声明》，会议强调加强合作，努力发展经济。

1991年6月3~8日第21届大会在圣地亚哥举行，着重讨论了重新活跃美洲国家组织、巩固地区民主进程、推动实施“美洲事业倡议”、加快地区一体化问题、联合开展反毒斗争和加强地区防务合作等问题，发表了《圣

地亚哥协议》。一些国家代表呼吁恢复古巴作为该组织成员国的合法权利。大会致函古巴，要求其恢复民主。

1992年5月18~23日，第22届大会在巴哈马首都拿骚举行，大会就民主、人权、禁毒、自由贸易、环保，反贫困，反对种族歧视和建立西半球安全委员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拿骚声明”及一系列有关决议。同年12月14~15日，第16次特别大会在华盛顿举行，签署了修改《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华盛顿议定书”，通过了阿根廷关于中止政变政府成员国资格的提案和墨西哥关于消除贫困是促进和巩固民主的组成部分及各国应承担义务的提案。

1993年6月6~11日，第23届大会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召开，发表了《促进民主和发展的马那瓜声明》，通过了关于修改本组织宪章、建立泛美一体化发展理事会、对海地实施经济制裁、加快恢复危地马拉和平进程等决议，但在准许古巴重返该组织和向海地派遣500名武装警察上未达成共识。

1994年2月17日，美洲国家组织合作与发展大会（第20次特别大会）在墨西哥城召开，讨论了加强地区合作、寻求全面发展、消除极端贫困等问题，通过了《推动共同合作和消除贫困的承诺》和《合作与发展的总政策和优先解决的问题》两个文件。6月6~10日，第24届大会在巴西贝伦举行，讨论了西半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主化、反毒品、环保等问题，通过了《贝伦声明》，重申为实现美洲大陆的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作出努力，并通过加强制裁海地的决议。

1995年3月3日，泛美人权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食品和药品限制，反对美对古实

施长达 30 年之久的禁运政策。6 月 5~9 日,第 25 届大会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举行,大会首次把古巴问题列入议程。大会就社会发展、民主进程、经济一体化、消除贫困、环保、缉毒、反腐败、反恐怖活动及有关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新观念》等文件。6 月 30 日,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在美丹佛市举行,发表了《联合声明》和《行动计划》两个文件,重申 1994 年美洲首脑会议制定的关于在 2005 年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决定成立包括贸易技术壁垒、卫生和检疫在内的 7 个工作小组,并决定下两届贸易部长会议于 1996 年和 1997 年在哥伦比亚和巴西召开。11 月 6~7 日,美洲国家组织“反腐败研讨会”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召开,要求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寻求有效方法进行反腐败斗争,通过了《蒙得维的亚研讨会决议》。11 月 8~11 日,美洲国家组织首次“信任和安全问题”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就促进本大陆相互信任、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关于促进相互信任与安全措施的圣地亚哥声明》。

1996 年 3 月 27~29 日,美洲国家组织反腐败会议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通过了《泛美反腐败公约》。6 月 3~7 日,第 26 届大会在巴拿马城举行,主要讨论了打击贩毒、腐败和恐怖活动,加强西半球民主体制和促进美洲地区一体化等问题,通过了《巴拿马协议》(决定成立“美洲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巴拿马声明》、《巴拿马协定》、《关于支持危地马拉实现和平进程的决议》、《关于西半球贸易和投资自由的决议》。10 月 7~9 日,第二届美洲国家国防部长会议在阿根廷巴里洛切市举行,讨论了美洲地区安全、防务合作和缉毒等问题,

举行。通过了《西半球预防、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加强合作》的决议，谴责 9·11 事件恐怖主义行径，对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并决定重新启用《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

2002 年 6 月 2~4 日，第 32 届大会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举行。34 个成员国外长或代表与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反恐和贫困问题，签署了《美洲反恐条约》，加拿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克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表示将在通过国内法律程序后签署该条约。

2003 年 6 月 8~10 日，第 33 届大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民主执政、反恐、缉毒、腐败、消除贫困和自由贸易等问题，通过了《关于治理美洲的新承诺：民主与公民信任的圣地亚哥声明》，指出司法改革与现代化是巩固法治国家的核心；强调维护民主、健全法制、提高司法效率和整体发展是美洲人民和平、稳定和进步的基础，也是民主执政的根本所在；呼吁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现行金融体制，以实际行动支持美洲国家民主执政。大会还通过决议，支持阿根廷通过和平对话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

2003 年 10 月 27-28 日，该组织安全特别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34 个成员国的近 30 名外长、防长等与会，会议签署了《美洲安全宣言》，指出贫困、艾滋病、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贩毒、腐败、军火走私和贩卖人口等是美洲面临新的安全威胁，各方承诺加强消除贫困合作，捍卫民主体制，和平解决争端，减少军费，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美国禁止对古巴的贸易

1962年1月22~30日,第8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通过关于将古巴政府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停止同古进行一切武器和军事装备贸易的决议。

在美国制裁的国家中,古巴是除朝鲜外受害最久的国家。在40年的封锁和禁运下,古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并未被近在咫尺的超级大国压垮。同时,国际社会要求解除对古制裁的呼声增高,美国内对制裁古巴政策的批评增多。美压古促变未果,不得不调整以制裁为主的对古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美依据冷战思维制定的政策将愈来愈难以为继,进一步放松和最终取消对古巴的制裁是大势所趋。

1959年古巴革命获得成功后,美国曾一度承认古巴新政府,但不久因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建交和将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资产收归国有,与古巴关系恶化。1960年10月,美国宣布开始对古巴补入除食品和药品之外的经济禁运。1961年1月,美国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1962年2月,美国对古巴实施全面制裁,禁止从古巴进口和通过其它国家向古巴出口美国产品,中断援助那些向古巴提供帮助的国家。同年10月,美国决定不向运送武器给古巴的国家开放港口,禁止与古巴进行贸易的公司的船只运送美国的货物。1963年7月,美国冻结在美的全部资产。面对美国的封锁,古巴奋力抗争,绝不屈服。在卡斯生气勃勃罗的领导下,古巴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昂首挺立。美国不得不在1974年与古巴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秘密进行谈判,但因在安哥拉、人权

等问题上与古分歧严重而未果。1977年9月，两国同意在对方首都开设照管办事处，以处理两国间的依赖和其他事务。直至今日，美古仍未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冷战结束后，对美古关系不得的美苏争霸因素消失，为美放弃冷战时期做法，改善与古巴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美却冷子管历史潮流而行，乘古推动前苏联援助，经济陷入困境之机，加大制裁强度，试图压古步前苏联和东欧后尘，改变社会制度。1992年10月，美国总统批准扩大对古制裁的“托里切利”法案，禁止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禁止美国公民赴古旅行和向古巴的亲属汇款。1996年3月，美总统以古巴击落两架侵入古巴领空的飞机为由，签署了干涉加强对古制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宣布将惩罚与古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允许美国公民有权对使用其在古被没收的资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起诉并不准这些投资者进入美国。美对古制裁达到顶点。

由于古巴是受美制裁国家中离美最近的国家，因而受害最深。40年来，美国的制裁给古巴造成6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导致古国内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和药品短缺，出走海外事件屡屡发生，酿成多起移民潮危机。1980年，约1万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古巴领事馆，要求移居美国。古放松移民限制，当年约12万古巴人涌入美轻美国接受移民问题的能力形成压力。同年年底，美古就古巴移民问题开始举行谈判并于1984年达成移民协定。1994年8月，约3万古巴人乘数千艘小船漂往美国，酿成又一场移民潮危机。美国无力接受大量古巴移民，与古就移民问题再次谈判后发表联合公报，美国同意每年至少接受两万古巴移民，古巴承诺不鼓励本国

公民随意离开古巴。但美实际上的做法是：一方面不按协议规定如数发放签证，另一方面又鼓动古巴公民出走，称通过非法途径抵美的古巴公民为“反卡劳动保护生气勃勃罗英雄”，均给予居住权，这就造成古巴移民铤而走险，飘流过海，频繁发生遇难事件的人道主义灾难。据美政府估计，仅从1959年到1980年，就有约100万古巴公民移居海外。美试图以此损害古巴政府的形象并引发古巴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促使古巴政府革命政权垮台。

美对古巴进行封锁和禁运的主要目的是给古巴制造经济困难，压古巴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但古巴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尤其在冷战后失去前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古巴及时调整政策，发展经济，成就显著。同时，包括美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要求美放弃对古封锁。美国有识之士也批评美国斩制裁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甚至在美的古巴人变出现反对美国制裁的趋势。美孤掌难鸣，难达目的，对古制裁陷入困境。

首先，美制裁古巴政策未能奏效。40年封锁虽然给古巴带来巨大损失，但古巴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尤其近几年，古巴经济复苏，政治稳定，使美国制裁获得成功的希望愈来愈加渺茫。1989年至1993年，由于前苏联集团中断与古巴的贸易和援助关系，受美国制裁的古巴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生产总值下滑35%。面对困难局面，古巴政府进行经济改革，调整物价和税收政策，发展个体经济，开放市场，吸引外交，改革国有企业。古巴的改革政策取得成效，其经济从1994年开始走出低谷，逐渐增长。1999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2%，在拉美名列前茅；劳动率提高4%；失

业率从 1998 年的 6.6% 降至 6.1%；物价平稳；本国货币稳中有升。古巴政府还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利益的种种犯罪活动，保持社会安定。美国的制裁已告失败。

其次，国际社会反对美国制裁政策，古巴外部环境大为改善；美国孤立古巴未果，反而自陷孤立。冷战结束后，古巴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调整对外政策，将取得国际同情与支持作为主要任务并成功。1995 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联合国 50 周年庆典活动上所作的古巴“面对世界最强国生存下来”的演说博得了热烈掌声。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伸张正义，站在古巴一边。迄至去年 11 月，联合国已连续 8 年以压倒多数通过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制裁的决议。同月，第 9 届伊比利亚美洲会议在哈瓦那成功举行。同年，爱尔兰和巴拉圭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与古建交的国家达到 169 个。古还结束了长达 13 年的观察国身份，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的成员国。此外，欧盟在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生效后威胁将上诉世贸组织，指控该法违反自由贸易的原则，美担心与欧盟对簿公堂和爆发贸易战，被迫多次推迟该法部分条款的实施。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 1998 年访问古巴时也强烈呼吁解除对古封锁。古巴赢得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同情和支持，而美国制裁古巴的政策却面临国际社会要求解禁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制裁古巴损人不利己，美国内要求放弃对古巴制裁的呼声日益增高。西欧、日本乘美制裁之机纷纷与古巴发展经贸关系，美失去在古巴的经济利益。据估计，如解除对古封锁，美每年可从两国贸易中获利 10 亿多美元。美工商界对此极为不满，美商会主席多纳休

表示，“制裁古巴损害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美国商会决心站在全世界取消单方面制裁斗争中的最前列。”美多数议员支持取消对古制裁。1998年10月，美国会16名议员致函克林顿总统，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封锁古巴给美古双方造成的影响表示关切，建议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重新审视美国的古巴政策。美国人民对美现行的古巴政策已经过时。据美外交政策协会于去年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79%的美国人反对“赫尔姆斯·伯顿”，希望取消对古巴的制裁并承认卡斯特罗政府。美公众对鼓励古巴公民移居美国，造成海上遇难事件并给美国带来移民压力进而造成社会问题十分不满。一些学者批评美国的制裁损害了古巴人民的利益，侵犯了古巴的人权。连长期反对古巴革命政权的劳联-产联也在去年8月通过决议，呼吁结束对古禁运。面对国内批评，美制裁古巴的政策难以持久。

此外，美国的古巴人社团内部发生变化，反对同古巴政府缓和关系的居美的古巴人保守组织的传统影响力正在减弱，出现了反对对古禁运的新一代人。去年7月，约300名古巴人在华盛顿集会，要求取消对古制裁。美国迈阿密市古巴民主委员会执行干事动乱莱娜表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不仅希望开放古巴，而且希望开放迈阿密。我们理解我们父辈那一代的挫折，但是，又换了一代人，50岁以下的人的看法不同了。”居美古巴人对制裁态度的变化，对美国调整过时的对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制裁措施未能迫使古巴人放弃已选择的社会制度，反而损害自身利益并面临国际社会和美国内要求解禁的压力，不得不在近两年开始放松对古制裁，美国

高级官员和政界要人及体育代表团接连访问古巴，与古领导人接触，两国关系出现松动。

1998年3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采取4项使古巴能够获利更多人道主义物资的措施：恢复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飞机从美国起航古巴；允许旅美古巴人每年向其国内亲属汇款1200亿美元；加快向古巴出口药品的审批过程；请国会制定向古巴提供食品等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法律。同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通过了美政府取消对古巴禁运的两党方案。该方案是40年来第一个由美国州议会的此类议案。1999年1月5日，克林顿再次宣布放松对古制裁措施：减少美国公民向古巴亲属或非政府组织邮寄现金金额的限制；允许向古巴非政府机构和私营实体出售美国食品和农作物；扩大美古两国民间交往和体育往来；允许不翼而爱邮；允许包机飞往除哈瓦那以外援古巴城市等。同年8月，美参院通过允许无限制向古巴出口基本食品和药物的有关议案。

此外，美政府一再推迟执行“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该法第三条允许美国国民有权对使用其在古巴被没收的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起诉。从该法第三条于1996年8月生效起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克林顿已连续8次推迟该法第三条的实施，使该法条款从未得到实施，从而使“赫尔姆斯·伯顿”法的执行大打折扣。

同时，美国政要纷纷访古，与古巴领导人接触。去年8月，美参议员达施勒和多根对古巴进行了9天访问，并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他们在访问回国后发表的声明中呼吁放松对古制裁。同年10月下旬，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瑞安（共和党人）率领由州议员、企业家、农场主和其他方面共50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对古

巴进行了 5 天的访问。古巴主席卡斯特罗会见了瑞安。瑞安是 40 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最高领导人。此访得到美财政部的批准，意义深远。美其它一些州，如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威斯康星和怀俄明等州的州长也计划在今后访问古巴。今年 1 月，包括美前农业部长布洛克在内的农业代表团对古巴进行了 4 天访问。在古期间，该团要求美政府取消对古巴实行了 40 年的经济封锁，以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月，美国医疗保健用品展览在古举行，这是近 40 年来美国首次在古巴举办的贸易展览。

美国棒球队也于去年 4 月访问古巴，与古巴国家棒球队举行比赛。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新临现场观战，与美国运动员一一握手。哈瓦那拉丁美洲体育场座无虚席，5.5 万名观众观看了比赛，两国国歌响彻赛场上空。这是 40 年来第一支访问古巴的美国棒球队，对恢复两国体育交流，促进两国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日益凸显，将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手段有悖于时代潮流，且越来越不得人心。深患“制裁成瘾”症的美国为自身战略利益被迫反思和调整其制裁政策，持续 40 年的对古巴经济经济封锁不可能再长期继续下去。但是美在短期内不可能彻底放弃对古制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虽放松对古制裁，但仍迫使古巴改变社会制度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一再声称：“美国的政策十分明确。我们要在古巴实现向民主的和平转变。这一目标简明且不可支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永不放弃我们的原则，不停止我们的努力。”美政府还声称放松制裁是为了“减轻古巴人民的痛苦”，而不是“支持古巴政府”。美不放弃

古巴社会制度的目标，致使两国气氛紧张，不时引发加剧双方敌对气氛的事件。近来，美古围绕在美古巴男孩埃连监护权的问题及美以“间谍”罪驱逐古驻美外交官事件展开斗争，反映也美敌视古巴政策所导致的两国矛盾根深蒂固，远非一日可以化解。

此外，尽管美籍古巴人出现了要求解除对古禁运的呼声，但美反对古巴的院外集团和在美的古巴流亡组织仍颇具能量，反对美放松对古巴制裁，对美大幅度调整古巴政策形成掣肘。例如，美移民局在今年1月作出了古巴男孩埃连可以返回古巴的决定并等到美总统克林顿的支持，但随后在反古势力的压力下，美移民局又决定暂停送还程序。

美对通过制裁压古社会制度仍存幻想，也是美不会轻易彻底放弃对古封锁的一个重要原因。古巴经济虽有好转，但仍面临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足和偿还器量外债等问题；有一些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仍较活跃，公民出走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均被美视为继续对古进行制裁的有利条件。因此，美在放松对古经济制裁的同时，宣布将加强反对古巴现政权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继续对古巴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古巴“进行变革”。到目前为止，克林顿下令仍然拒绝1998年底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委员会，重新审查和评估美国封锁古巴政策的建议。

目前，美国已步入大选年，民主党政府为避免招致对手在第三的古巴问题上大做文章和失去反古势力的选票，亦不大可能在今年彻底放弃对古制裁。

然而，对话代替对抗，合作取代制裁已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的。那种为迫使他国人民对社会制度的选择而

制定的制裁政策早已被世人所唾弃。因此，无论何人入主白宫，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都不得不在当政后逐步放松对古封锁。这一进程虽然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

美苏载人宇航飞行的探索与成功首开世界先河

1961年4月12日，苏联在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1957年10月4日)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把世界上第一个宇航员——刚刚提升为少校的空军上尉尤里 A. 加加林送入了太空，从此揭开了人类载人航天活动的序幕。我国于1970年4月24日把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成为继苏联(1957年10月4日)、美国(1958年1月31日)、法国(1965年11月26日)、日本(1970年2月11日)之后第5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33年后的今天，当“神舟5号”飞船成功遨游太空，我国已成为第三个具有独立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之际，我们追忆人类载人航天活动初期的历史，可以有助于理解我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当前所处的位置，明确我国航天活动的长远发展计划和目标。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苏在以纳粹德国V-2飞弹的技术为基础开发弹道导弹技术的同时相继进行了将生物送入高空或太空的实验。苏联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后的一个月，即1957年11月3日，紧接着又发射了“斯普特尼克2号”人造卫星，这枚人造卫星中乘坐着进入太空的第一个“航天员”——小狗“莱伊卡”(Laika)。太空中的这段时间“莱伊卡”生活在卫星中的一个有空气、食物和水的供应保障的小舱里，它的一切状况通过无线电遥测直接传

送到地面。在地面上可以看到从卫星点火、发射、加速、入轨直到失重等飞行条件下，“莱伊卡”的状态一直很好，但因为当时没有解决飞行器的再入回收问题，“莱伊卡”在轨道上飞行一周之后无病死亡（据近几年最新披露的档案，“莱伊卡”进入轨道后的第4圈，由于小舱内超出设计预想的高温，地面中心已经收不到任何生理传感器的数据信号，表明小狗“莱伊卡”事实上已经死亡）。“莱伊卡”的飞行直接地说明了航天器内的条件至少短期内不会对生命造成致命的威胁。

美国继1958年1月31日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后，于1958年12月12日发射了头锥舱中乘有长尾猴的丘辟特洲际弹道导弹，但发射后导弹溅落在海中丢失。1959年5月28日，两只猴子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丘辟特导弹的头锥舱里飞行后回收，一只猴子在拆除生物电极的一次手术后死去，另一只存活下来饲养在亚拉巴马空间火箭中心。1961年1月31日，62公斤重的哈姆黑猩猩乘“水星”号飞船座舱由“红石”火箭助推进行了高度为249公里，飞行距离为676公里的亚轨道飞行后成功返回地面。1961年11月29日（此时，宇航员阿兰·B·谢帕德已经于当年的5月5日乘“水星”号飞船进行了一次亚轨道飞行；维吉尔·I·格里索姆于7月21日进行了第二次亚轨道飞行）黑猩猩“恩诺思”被置于宇宙飞船“水星”号上完成了一次重要飞行，绕地两圈的飞行过程中“恩诺思”吃了食品，并完成了几项已经训练好的心理学试验。由于飞船产生了不正常的滚动，被命令下降返回。在飞行结束时由于系统出现故障，回收舱内温度曾高达40℃，但还是成功地返回了地面，“恩诺思”幸免于死。之后生物学专家们对动物进行了

认真细致的观察和生物遗传学研究。

在这一系列飞行试验的基础上，航天医学专家基本取得了希望的结果，认为太空飞行对人体不会有太大的威胁。于是开始考虑将人送上太空。

1958年，在航天专家科罗廖夫的带领下苏联正式开始了载人航天的研究工作。为了保证航天员进入太空的安全性，一部分技术人员们希望首次的载人飞行不要进入绕地球的轨道，而是先采用亚轨道的飞行方式，之后再循序渐进展开轨道飞行。但科罗廖夫考虑到亚轨道飞行要做的工作量几乎与轨道飞行相同，而且在对太空飞行作了相当程度的分析后，认为人类直接进入太空的威胁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所以最终决定采用直接进行载人轨道飞行。当然，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政治的压力也是科罗廖夫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亚轨道飞行方式是指太空船进入太空，但未进入绕地球轨道的一种飞行状态。亚轨道飞行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成果，并且保证较高的安全性。

到1959年初，苏联第一艘载人飞船开始具体设计，并取名为东方(Vostok)号。东方号的乘员舱采用球形，这主要是考虑到飞行器返回时经过大气层，大气分子与飞行器发生急剧压缩会产生极大的热量，而球形可以很好的减少这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并且能在各种速度下保持稳定。在球形乘员舱的外部安装了不同的遥控天线和通信天线，通信天线的下端是一个小型的电子设备舱，航天员坐在乘员舱内通过各种仪器与外部保持联系。乘员舱的侧面还有一个圆形的观察窗和一个弹射窗。

为了防热，船体的材料采用了弹道导弹常用的高密度烧蚀材料，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飞船再入的气动环境

与弹道导弹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这种材料并不适于航天返回时的环境条件，在以后的设计中才转为使用隔热性能好的低密度的烧蚀防热材料。这种烧蚀材料在进入大气层时，与大气摩擦会一层一层地烧蚀成炭，当炭灰飘散时会带走多余的能量。

在球形的下面是一个圆台和圆锥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紧靠乘员舱的一侧挂有 18 个球型高压氮气和氧气瓶，为乘员舱内的航天员提供尽可能类似地球的大气环境。气瓶下面的圆台是仪器舱，再往下是反推发动机和内部推进剂储箱。当要返回地面时该发动机可将飞船的速度降到大约 155 米/秒，使飞船脱离轨道。

飞船发射后整个末级火箭与飞船是一同进入轨道的，这时飞船的总长达到了 7 米多。东方号飞船的轨道高度并不高，近地点的高度只有 180 千米。在这个高度下，大气对飞船轨道的衰减非常厉害，这主要是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如果反推火箭出现故障，可以保证飞船在 10 天内逐渐降低轨道，最终以不大的速度返回地面。

东方号采取陆地回收的方式。起初考虑航天员的安全，科罗廖夫提出海上回收的方案，但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坚持要求在陆地回收，而当时陆地回收的技术还不成熟，很可能会威胁航天员的安全。最终不得不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不回收返回舱而只回收航天员，即在返回舱再入离地面 10000 米左右，将航天员连同座椅一道弹射出去，并用降落伞回收。

事实上东方号所采用的不回收返回舱而只回收航天员的方法并不安全，因为航天员在弹射时的速度比飞机

弹射时快得多，航天员用降落伞能否着陆成功专家们也不敢保证。1960年12月用动物做弹射降落试验时就发生了死亡事故。

在确认“东方号”飞船能够载人之前，曾对它做过五次飞行试验。在1960年5月15日到1961年3月25日之间，这五艘不载人飞船都是借用“科拉伯卫星”的名字作轨道飞行的。它们载了狗、假人和各种各样的生物实验仪器。它们当中有四艘带着宇航员座椅回收舱，三艘被回收。前三艘飞船与“东方2号”飞船一样，绕地球飞行了17圈。最后两艘，像“东方1号”飞船一样，在回收前仅绕地球飞行了一圈。1960年12月1日，苏联把放在斯普特尼克6号（东方号飞船原型）里的两条小狗（姆什卡和皮契卡）送上天。绕地球飞行24小时后，地面控制站令其点燃制动火箭返回地面。但卫星出了偏差，它的返回轨道过于陡直，因而回收舱在进入大气层中烧毁。1961年3月9日，“东方号”飞船载着小狗兹韦斯达契卡和一个假人成功地绕地球飞行了一圈后返回地面。1961年3月25日，“东方”号宇宙飞船进行了载人空间飞行之前的最后一次试飞，绕地球飞行了一圈后成功回收。这次试飞载有一个假人和一条契尔努什卡小狗。经过了一系列的试验飞行后，东方号飞船做好了载人轨道飞行的最后准备。1961年4月3日，苏联政府批准了载人轨道飞行。同月12日一枚R-7A运载火箭装载着“东方-1”号，将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名使者——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迈出了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步。

“东方-1”号的飞行过程

莫斯科时间 1961年4月12日过程

9:07 东方1号飞船发射升空

- 9:09 东方 1 号运载火箭助推级和第一级脱落
- 9:10 运载火箭头部整流罩抛离
- 9:12 第二级火箭分离，第三级火箭点火
- 9:21 第三级连同飞船进入 180 ~ 230 千米地球轨道
- 9:49 东方 1 号飞船进入地球阴影
- 10:09 东方 1 号飞船离开地球阴影
- 10:25 反推发动机点火，飞船降低轨道准备进入
- 10:35 下降舱分离后进入大气层，距地面 7.2 千米高时加加林弹射
- 10:55 加加林落在萨拉托夫地区恩格尔城西南 26 千米处

继加加林之后，东方号又进行了 5 次载人轨道飞行，为苏联争取了太空竞赛中一个又一个第一。这里面包括比耶科夫斯基驾驶东方-5 号飞船创造了留空 119 小时的纪录，以及世界第一个女航天员瓦伦蒂娜·捷列什科娃乘坐东方-6 号升空。就载人航天技术来说，整个东方号计划在医学实验上特别是人在轨道飞行期间的反应和适应性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但由于飞船的限制和其他原因，东方号飞船的太空飞行在其它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多的研究成果。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的许多军事和研究部门就开始了载人航天所需的各种技术和可能性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大量的论证报告和方案，但是由于各单位独立行事，缺乏合作思想，局面十分纷乱，因此并没有形成可执行的计划。这种状况直到 1958 年才得以改观。不过也正因为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美国在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这一时期提出的逃逸救生塔方案和用于减弱过载的“轮

廓座椅” (ContourCouch) 在后来的载人航天计划中都获得了应用。

逃逸救生塔方案是为了保证航天员在发射段的安全而提出的。载人飞船的上方安装了一圈小型固体火箭，喷口朝斜下方，当运载火箭点火或其它原因出现紧急情况时，启动小火箭可将整个飞船迅速脱离危险的运载火箭，然后用降落伞或弹射方法使航天员着陆。

当火箭携带航天器加速飞行时所产生的加速度超过地面重力加速度的倍数称为过载，“地面重力加速度”规定用“g”来表示，近似为 9.8m/s^2 ，超过 2 倍就是 $2g$ ；而超过 10 倍就是 $10g$ 。过载对航天器内部仪器，特别对体会产生直接影响。过载太大，航天员轻则昏迷，重则器官破坏甚至死亡。所以载人飞船的发射和返回都要保证不超过一定的过载。一般发射或者返回时，人体可以承受 $15g$ 或者更大的过载。而能够保证航天员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过载值一般不超过 $4 \sim 5g$ 。

为了尽快结束航天事业发展中的混乱局面，更快地发展航天技术，美国在 1958 年制定了太空法案 (SpaceAct)，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太空研究的计划、方向和目标，并且成立了新的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 (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NASA)，将有关航空航天发展计划都纳入到该组织中。1958 年 8 月 8 日，NASA 正式接手载人航天计划，并于不久后的 10 月 7 日公布了水星 (Mercury) 号载人飞船计划。该计划旨在送一个人进入轨道，研究他在太空中的能力和反映，并安全返回地面。

水星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与东方号计划基本相同。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圆锥形的飞船，总长约 2.9 米，底

部直径约 1.8 米。飞船的顶端还有一枚逃逸火箭。底端的制动火箭为回收时提供脱离轨道的推力。进入大气层时，飞船底端的烧蚀材料用于防热。当太空舱落入较低的大气层时，太空舱顶端的降落伞打开，使航天员和太空舱安全地降落在海洋中。

为了争取美苏这场太空竞赛的第一，美国的工程师们作了很大的努力。可水星号早期的实验并不顺利，发生了多次事故。1961 年春季这种情况似乎有了好转，1 月和 3 月的两次实验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为了在太空竞赛中抢先一步，太空任务小组提议提前进行载人航天飞行，但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却坚持要按原计划进行。4 月 12 日，加加林实现太空飞行后，时间显得更加紧迫。令美国人可以稍许宽慰的是，5 月 5 日，航天员阿兰·B·谢帕德乘坐水星飞船“自由 7 号”实现了一次亚轨道飞行，这次飞行被赫鲁晓夫称为“跳蚤的一跃”。之后 NASA 又进行了几次亚轨道和轨道飞行试验，对轨道飞行进行了充分的验证。1962 年 2 月 20 日，航天员约翰·H·格林乘坐宇宙神 (Atlas)-D 运载火箭助推的“友谊 7 号”飞船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起飞，并绕地球飞行了三圈，终于实现了美国人的航天梦。此后，水星号又进行了 3 次太空飞行。

水星计划虽然晚于苏联 10 个月才实现轨道飞行，但其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却比东方计划更大，美国在整个水星计划中，将多种导弹改进作为运载火箭，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为后来的大型航天计划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水星计划在技术上虽然比较复杂，可整个开发过程比较科学，具有推广的潜力，并且发展了几项新技术，在大型航天计划的管理上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美苏/俄载人航天计划历程简介

20世纪60年代,美、苏在太空竞赛中为了拿到头彩,各自从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卡纳维拉尔角和位于咸海以东、丘拉塔姆荒原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向太空发射了三十多艘载人飞船,完成六十多人次的太空飞行。此后,美、苏/俄在载人航天上走入了有各自特色的历程。苏/俄的载人宇宙飞船及空间计划先后经历了“东方号”1,2,3,4,5,6(单人宇宙飞船,分别发射于1957年10月4日、1961年8月6日、1962年8月11日、1963年8月12日、1963年6月14日、1963年6月16日)、“上升号”1,2(由“东方号”飞船改进而来,分别为发射于1964年10月12日的三人宇宙飞船,及发射于1965年3月18日的带过渡舱的用于阿列克塞A.列昂诺夫空间行走计划的双人型号)、“联盟号”(三人宇宙飞船,1967年4月23日首飞,因太阳帆板的展开故障和降落伞打开故障回收时坠毁,宇航员弗拉基米尔M.科马罗夫上校牺牲,1968年10月26日第三次试飞时成功进行了载人飞行)、“礼炮”1-7号空间站(分别发射于1971年4月19日—工作175天;1973年4月3日—据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跟踪站监视,4月25日该站业已破碎;1974年6月25日—1975年1月24日,1974年12月26日,1976年6月22日,1977年9月29日,1982年4月19日)、“和平”号空间站(1986年6月20日第一批组件升空,2001年3月23日受控坠入南太平洋)、“暴风雪”号航天飞机(1988年11月15日于拜科努尔发射场由新型“能源”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首航为无人驾驶飞行,首航成功后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该计划现已基本停止)、和国际空间站(在建)计划。美国的载

人航天计划经历了“水星”号 3, 4, 6, 7, 8, 9(单人宇宙飞船, 分别发射于 1961 年 5 月 5 日, 1961 年 7 月 21 日, 1962 年 2 月 20 日, 1962 年 5 月 24 日, 1962 年 10 月 3 日和 1963 年 5 月 15 日)), “双子座”号 3, 4, 5, 7, 6, 8, 9, 10, 11, 12(双人宇宙飞船, 首次载人飞行前进行过 2 次无人驾驶飞行, 载人飞行分别发射于 1965 年 3 月 23 日, 1965 年月 3 日, 1965 年 8 月 21 日, 1965 年 12 月 14 日, 1965 年 12 月 12 日, 1966 年 3 月 16 日, 1966 年 6 月 3 日, 1966 年 7 月 18 日, 1966 年 9 月 22 日, 1966 年 11 月 11 日), “阿波罗”号飞船 1, 7, 8, 9, 10(三人宇宙飞船, 1 号飞船在 1967 年 1 月 27 日的地面演练时发生火灾, 3 名宇航员包括美国第一个完成舱外活动(“双子座”号)的爱德华 H. 怀特中校, 参加过“水星”飞船和“双子座”号飞船飞行计划拥有丰富飞行经验的弗吉尔 I. 格里索姆上校及第一次准备参加太空飞行的罗杰 B. 查菲少校遇难, 7 号发射于 1968 年 10 月 11 日用于在近地轨道检验飞船各系统的工作情况, 8 号发射于 1968 年 12 月 21 日并成功进行了绕月飞行, 9 号发射于 1969 年 3 月 3 日用于在近地轨道检验“阿波罗”飞船的服务舱与登月舱的交汇与对接功能, 10 号发射于 1969 年 5 月 18 日成功进行了绕月飞行, 登月舱进行了下降登月演练)及“阿波罗”11-17 号登月计划(分别发射于 1969 年 7 月 16 日; 1969 年 11 月 14 日; 1970 年 4 月 11 日, 因服务舱中的燃料电池氧气贮箱奔月途中发生爆炸, 登月任务取消, 宇航员成员组安全返回地面; 1971 年 1 月 31 日; 1971 年 7 月 26 日; 1972 年 4 月 16 日; 1972 年 12 月 7 日), “天空实验室”空间站(发射于 1973 年 5 月 14 日, 分别于 1973 年 5 月 25

日，1973年7月28日，1973年11月16日接受了3组宇航员的来访，1979年7月11日由于日益频繁的太阳黑子活动引起的地球大气层的膨胀对空间站阻力急剧增加，该空间站在比预期寿命短的多多的情况下受控坠入印度洋)，“哥伦比亚(Columbia)”号(于1981年4月12日首飞，2003年2月1日返回地面时解体)、“挑战者(Challenger)”号(于1983年4月04日首飞，1986年1月28日起飞时由于固体助推器的橡胶密封圈低温下失效而爆炸)、“发现(Discovery)”号(1984年8月30日首飞)、“亚特兰第斯(Atlantis)”号(1985年10月3日首飞)、“奋进(Endavour)”号(1992年5月7日首飞)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在建)计划。

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我国第一艘太空船“神舟号”在完成了21小时空间飞行试验之后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飞行试验。标志著“921工程”正式在世人面前亮相。

外界对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计划的猜测开始于1975年。当年11月29日，中国成功地回收了一颗返回式卫星，这是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第一步。中国和苏联卫星回收试验都是首次获得成功，而美国直到“发现者13号”才掌握卫星回收技术。

1979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幅中国宇航员戴著头盔，身著宇航服的照片。不久，另一份上海出版的杂志《科学画报》发表了更为详尽的中国训练太空人的照片，向外界展示了模拟训练舱，号称亚洲第一的离心加速器，太空服，甚至太空食品。人们纷纷猜测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已经起步，甚至怀疑宇航飞船原型机已经制

造出来，不久即将发射。然而各种传言喧嚣一阵之后就渐渐平息了。

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还不成熟，我国载人航天计划没有被提到日程上。随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许多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航天计划被优先考虑。在 80 年代，中国著力发展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载人航天计划被一再推迟，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60 年代成立的中国空间医学研究院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1986 年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报导，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把第一位中国宇航员送入太空的日子“已经不再遥远了。”到 80 年代后期，10 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使中国积累了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中国航天界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载人航天计划，其中包括发射小型航天飞机和建立空间站。然而，这些计划由于在技术上过于复杂，至今仍在筹划阶段，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将着眼于采用传统的“返回式太空舱”的设计构想。

1989 年我国和俄罗斯恢复正常关系以后，两国间的空间技术合作大大加强。1996 年 4 月 25 日，俄国宇航局长尤里克铁夫访华，签署了中俄空间技术合作协议。虽然协议内容没有对外界透露，但人们猜测中国可能有意购买俄国载人飞船的导航和对接控制系统。有专家甚至认为中国可能派出人员搭乘俄国飞船登上“和平号”空间站，并由中国技术人员使用俄国的跟踪测控系统，控制载人飞船，以获取实用经验。有报导说，中国在 1996 年 11 月确实派出两人到俄国宇航中心受训。他们在 1997 年完成训练任务，返回中国，并开始著手训练更多中国“太空人”。至于中国宇航员访问“和平号”空间站，

则一直没有确切消息。在近日公开的“和平号”工作日程里，从来没有迎接中国太空人到访的安排。

在 1996 年以前，中外媒体和专家都认为中国要到下个世纪才有可能发射载人太空船。然而在 1996 年 10 月，中国官方人士却对外透露要在 50 周年国庆时把太空人送上天。有关人士说，载人飞船的设计已经完成，并进入了工程制造阶段。

1998 年 3 月北京举行的一个航天技术展览会上，一位著名的中国空间技术专家透露，中国的载人太空飞行将是“近期的事”，“中国将努力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取得载人航天技术上的突破”。虽然他没有公布具体的研发日程，但 1999 年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时间。在这次展览会上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有关中国未来空间站的信息。专家分析，中国计划建造的空间站将由两个模块组成。

与此同时，中国加速研究新型长征运载火箭的消息也不胫而走。1998 年 3 月 18 日，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官方互联网站上出现了中国长征系列火箭的轮廓图。其中一个型号为长征 2E(A) 的火箭引人注目。它的增强推力达到 12 吨，使人们猜测是专门为发射载人太空舱而设计的。此外，中国还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长征 2E 火箭建新的发射平台，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载人航天技术的关键是太空舱回收技术。中国近 30 年来已经成功地回收了 16 颗卫星，只有一次失败。最近回收的一颗返回式卫星重达 2.8 吨，在轨道上停留了 15 天，与美国的“水星号”相当。分析家认为，中国的载人太空船会与俄国 Soyuz 载人飞船相似，它的一些部件

甚至可能之间购自俄国。中国长征 2E 火箭的发射重量为 92 吨到 120 吨之间。专家据此猜测，中国载人飞船的重量可能在 6-10 吨的范围内。

英国宇航杂志在分析了中国媒体上出现的运载火箭照片后认为，中国的载人太空船将重达 8.4 吨以上，可容纳 4 名宇航员。飞船将带有两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板，前端有突出的圆柱型模块。

西方航天专家在研究了有关中国“921 工程”的情报后认为，中国的载人太空船将带有对接系统，可以使两艘同一型号的飞船轻松对接，宇航员可以在内部自由往来。而前苏联在 60 年代发射的太空船无法对接，宇航员必须走出舱外，才能再进入另一艘飞船。中国太空船的内部通道设计可以很方便地使数艘太空船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小型空间站。

中国在发展运载火箭技术的同时没有停止空间生命保障技术的研究和试验。早在 60 年代，中国就将狗和老鼠送到了亚地球轨道。1990 年中国发射的一颗卫星上携带了 60 个动植物个体，包括老鼠和几内亚猪，并把它们活著带回地面。专家认为，中国已经掌握了短期太空飞行中的生命保障技术。

中国近日还宣布要发展 20 吨级与“质子”火箭相当的新型运载工具，用来发射自己的空间站。分析家认为，由于技术复杂成本过高，中国的载人空间站计划至少还需 10 年。然而一旦中国载人轨道飞行成功，就可能加入目前美俄领导的国际空间站计划。有人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在轨道上运行的国际空间站将连接中国建造和发射的模块。

继“神舟 1 号”之后，“神舟 2 号”于 2001 年 1

月 10 日升空，2001 年 1 月 6 日返回地面，据称由于降落伞系统故障，此次回收没取得完全成功。“神舟 3 号”于 2002 年 3 月 25 日升空，2002 年 4 月 2 日成功返回地面。由于“神舟 3 号”的技术状态与载人状态完全一致，其成功发射和返回，表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技术日臻成熟，为最终实现载人飞行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利用飞船开展空间科学研究和空间资源开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神舟 4 号”为我国载人航天飞行的最后一次演练，于 2002 年 12 月 30 日升空，2003 年 1 月 5 日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着陆，顺利回收。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美苏/俄载人航天计划对比及对我国的启示

苏联的载人航天计划在第一阶段通过 6 艘“东方号”单人宇宙飞船的飞行检验了人类在太空工作和生活的安全性与可能性，随后在“上升 1 号”和“上升 2 号”（均由“东方号”宇宙飞船改进而来）计划中检验了多人飞船运载技术和人类在空间行走的能力，全新的“联盟”号 3 人运载能力宇宙飞船进行了空间交汇、对接的技术演练，从最近解密资料看，“联盟”号本是作为苏联登月计划的一部分进行开发的，但由于随后的类似于美国“土星 5 号”级别的 N-1 登月火箭的 4 次试射都在起飞阶段就告失败，最终取消了登月计划转而致力于空间站技术的开发，由是“联盟”号及由“联盟”号改装而来的“进步”号货运飞船一直服务苏/俄及最近的国际空间站到现在。空间站计划中，“联盟”号充当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运送飞船和紧急情况下撤离空间站的救生飞船。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第一阶段通过 6 艘“水星号”单人宇宙飞船检验了人类在空间生存的可能

性，第二阶段通过 10 艘“双子座”号飞船的飞行为“阿波罗”登月计划进行了所必需的空间交汇、对接及空中行走的技术储备和演练，第三阶段则由“阿波罗”号 3 人宇宙飞船为主进行了 6 次成功的登月，从而在航天技术领域全面超越苏联。“阿波罗 17”号的飞行为登月计划画上句号后，美国曾尝试空间站计划，在“空间实验室”在远低于预计寿命的情况下坠落后，转而致力于能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技术的开发。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美苏/俄从冷战时代的激烈竞争和对抗走向合作，由此开辟了“和平”号和航天飞机联合飞行及最后多国合作的国际空间站合作计划的新局面。

当我们回顾美苏航天计划对各自的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收益时，最直观的印象是美国除在以“阿波罗”登月计划和航天飞机技术为代表的载人航天活动之外，在卫星通讯、遥感与成像、导航与定位、空间探测与侦查等各个领域都带动了全球性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革命性变化，而苏联的主要太空成就凸现在其频繁的载人空间站计划上，其直接服务于普通民众生活的空间科技成就则远逊于载人航天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把苏联在载人航天上的巨资投入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国民经济的回报作为后来苏联解体及俄罗斯经济久困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究其原因，苏联在整个空间计划中把注意力过于局限在有限的几个目标，而忽略了各领域尤其是基础技术的均衡发展，其结果是在一个又一个“第一”的光环下，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不多，时至今日“联盟”号和“进步”号的运载火箭的核心组件还是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艘载人飞船时的 R-7 洲际导弹的技术。许多后续的应用卫星和空间探测器的平台还是“东方号”飞

继进入布干达，布境内爆发了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间的连年战争，布干达王国迅速衰落。1890年，英、德签订瓜分东非协议，布干达划为英势力范围。1894年6月，英宣布布干达为其“保护国”。1896年，英将“保护国”范围扩展到乌全境，并于1907年在乌设总督。

1962年10月9日，乌宣布独立，保留布干达等4个自治王国，成立乌干达联邦，仍留在英联邦内。1963年10月，乌修改宪法，取消英派驻乌的总督，由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二世任总统。1966年4月，奥博特任总统。1967年9月，废除封建王国和联邦制，建立乌干达共和国。1971年1月，阿明发动政变，同年3月就任总统。1979年4月乌全国解放军攻占首都，卢莱、比奈萨、穆万加先后担任总统或国家元首。1980年12月，奥博特在大选中获胜，再度出任总统。1985年7月，奥凯洛发动政变，推翻奥博特政权，并出任国家元首。1986年1月25日，全国抵抗军攻占首都，推翻奥凯洛军政权，29日，穆塞韦尼就任总统。

政治穆塞韦尼执政后，建立并逐步完善以“全国抵抗运动”为核心的独特的“运动制”政治体制，实行民族和解，化解部族和宗教矛盾，组成了以抵运为主，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结束了乌连年内战的混乱状态，政局日趋稳定。

2000年，乌干达政局继续保持稳定。3月，数百名“恢复上帝十诫运动”邪教信徒在乌西南部鲁昆吉里地区的卡农古镇自焚，令全世界震惊。乌政府一方面强烈谴责邪教暴行，另一方面加强了对邪教的打击力度，维护了国内的稳定。6月，乌就继续实行“运动制”或改行多党制举行全民公决，“运动制”以绝对优势获胜，标志着

其作为乌国家政体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7月，乌政府对军队内部挪用、克扣驻刚果（金）士兵军饷一事展开调查，并以此为契机大力整顿军纪。9月，乌政府调整部分内阁成员的职务，涉及2位部长和7位国务部长。11月25至26日，“运动”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推荐穆塞韦尼代表运动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此次全会还有限度地放宽了对政党活动的限制，准许其成立总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发行报刊及设立电台和电视台等，会议通过的决议还敦促政府致力于创建东非联盟。年内，乌北部的“圣灵抵抗军”和西部的“民主同盟军”两支反政府武装活动猖獗，政府增派军队加大围剿力度，国内治安状况有所好转。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订停火协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考验的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纷纷要求独立，法国殖民统治陷入了日益崩溃的地步。

在此时期，法国的情报机构充当了镇压印度支那人民和北非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刽子手，也练就了一批思想保守、手段残酷的特工人员，各种谍报手段的运用在此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论是历史悠久的间谍派遣，还是较大规模地组建特种行动部队；无论是以乔装改扮的方式窃取机密，还是利用欺骗和利诱相结合的手段套取情报；无论是采取手段残忍的暗杀绑架，还是派遣特工深入敌后颠覆破坏……总之，在这场反对殖民地独立的战争中，法国情

报机构演绎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

19世纪末，法国在远东占据了印支半岛这个重要的殖民地，几十年来，从这里攫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将其夺走，半岛上出现了一股以“越南独立同盟”为核心的民族独立势力。

日本战败后，法国急于将其收回自己的囊中，可越盟却宣布越南独立，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了法国的殖民统治体系猛烈一击。法国政府自然不能坐视，立即向这个新崛起的敌人开战，挑起了长达8年之久的印支战争。

1946年9月1日，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正式组建第十一突击团，并将其派遣到方圆几千公里的印支地区，以适应秘密战争的需要。

突击队员大都是从原自由法兰西突击部队中选拔出来的核心骨干分子，他们在抗击纳粹斗争中的表现都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在最危险的突击战斗中，还是在完成最艰巨的任务时都经受过严峻的考验。

巴格拉是一只凶猛的黑豹，一名撒哈拉沙漠部队的元老选中了黑豹头像作为第十一突击团的标志。突击团受正规军参谋部和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双重领导。

印支半岛地处亚热带地区，地表山高坡陡，杂木丛生，少数平原地区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极不利于大兵团地面机动，法军指挥部因此对这支突击队寄以厚望。这支突击队人数约600人，其队员都受过非常严格的专门技术训练，能使用各种武器，进行活动时，一般编为人数不等的小组。

这支突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游击战和反游击战，对敌军进行渗透和突袭，搜集对方的军事情报，毒化越

盟的情报机构，破坏并铲除越盟的通讯联络线，当然还包括对越盟的要员实行劫持和刺杀行动。

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第十一突击团犹如一只凶猛的黑豹，在丛山密林中神出鬼没，很快便成了越盟部队的强硬对手。胡志明不得不动用他最精悍的部队来对付法国行动处的这支部队。

到了1954年初，印支战争已进入第8个年头，法国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所耗费的资财已近44亿美元，但这场战争的“胜利结束”却遥遥无期。法军已六易主帅，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勒克莱尔和塔西尼均已先后成为越南人民手下的败将。法军屡战屡败，龟缩在沿海的几个据点里，丧失了发动进攻的能力。1953年上任的法军司令纳瓦尔企图夺回战场上的主动权，于该年11月在离河内以西200多公里

处的奠边府集结重兵，打算与越盟部队决一死战。

1954年3月13日，奠边府战役打响。1万多名法军士兵逐步陷入越盟军队的重围，开始了一场为期2个月的恶战。

为加强守军力量，法军决定派伞兵前往救援。第十一突击团也被空投到奠边府，充当地面部队，进行艰苦的防御战。5月7日，在越盟部队强大的攻势面前，奠边府终被攻克，以伞兵为主力的守军大部被歼，遭遇了灭顶之灾。

7月21日，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正式签署，法国政府被迫同意结束战争，撤出印支。8月，第十一突击团也随整个“印支远征军”狼狈地撤出了越南。

铩羽而归的第十一突击团经历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不断地与游击队长期斗争之后，于1962年1月被

解散。直到 1985 年 10 月 9 日，国防部长保尔·吉莱斯宣布重建第十一突击团。以后，这支对外安全总局的优秀团队在进行准军事行动的各种活动中再度频频亮相。

“非洲，我们来了！”

早在 1953 年，法国高级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法属北非的非殖民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因此，为了避免在上述事态发生时措手不及，法国开始着手在这些国家建立谍报系统。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也就此把目光瞄准了北非。

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在非洲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可以长期存在的地下秘密谍报系统，收集各种机密情报、文件和报告，掌握殖民地中各主要政治派别的动向，同时，也了解美英等国在北非的活动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国家一直试图把触角伸向法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苏联人也不甘寂寞，把手伸了进来。

300 名法国特工人员在外国情报及反间谍局的派遣下，秘密潜入非洲，他们披上了各种伪装的外衣，有的装扮成摄影记者、掮客、军火商，有的甚至充当冒牌的妓院老板，并配备有活动器械和大量传递情报的工具。

然而，这些伪装都难以持久，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而且经常出问题，因此必须寻找更为妥善的办法。于是，情报部门开始在法国在非洲的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洲际航空运输公司、联合装卸公司等航运企业中发展联络员，并通过他们，使一部分特工人员在这些公司内找到可靠的正式职业。这样，特工人员就可以自由地往来于法国和非洲之间。

法国情报机构还成功地发展了联合海空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卢伯利为第七处的特工人员。此人曾以飞行员的

身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是海军航空部队方面的专家，他还是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得力助手，他当时领导着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开办的企业——奥林匹克航空公司。船王去世后，他成为该财团的头面人物，当上了“奥纳西斯基金会”的董事长。多亏有了他，才使得法国情报机构在 50 年代末大大加强了对非洲的无形控制。

为了扎根北非，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看准了非洲大陆水资源奇缺的特点，不惜花费巨资在摩洛哥开办了“法兰西蓄水器材公司”，它实际上是一家以掩护法国情报人员在非洲进行秘密活动为目的的企业。公司总部设在圣拉扎炙大街，公司内的推销员、代理人、搬运工实际上都是法国的特工人员。该公司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在非洲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雇佣了大批职员，联系广泛，业务繁忙。

此外，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还买下了黎巴嫩在非洲开设的几家小企业的部分股份，除筹建几个进出口分公司外，还兴办了法兰西棉纺织品公司，经营棉织布匹和衣物，通过各地的这些公司把大部分特工人员分散安插到这些普通且不引人注意的岗位上去，以避免因一个间谍暴露而殃及其他人员。

考虑到必须尽可能地适应非洲的环境，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还对非洲的汽车加油和修理服务行业发生了兴趣。在这些幅员广阔的非洲国家里，由于缺乏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私人汽车很吃香，汽油同水一样宝贵，因此，到处都需要有汽车加油站以及提供修理服务的工人。那么，如果披上汽车加油站管理员的外衣从事谍报活动，这不是更能掩人耳目吗？于是，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两名特工人员为

一个小组，合伙购买一家汽车加油站。

这样，万一某个特工人员被捕，也不会一下子怀疑到在非洲“工作”的其他加油工。

白天，这些特工人员在铺子里穿上满身油污的衣服，真的像加油工和修理工那样，从早干到晚，接待顾客、卖油、修补轮胎。夜深人静时，他们则擦去浑身的汗水，洗去油污，换上衣服，出去执行他们的“本行”。他们所要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偷拆外交邮袋和信件、接收联络员写的报告、窃听政界要人的私下讲话、编译电报、用带去的秘密电台向总部拍发收集法国特工人员就是这样，在偏僻荒漠的非洲地区为了阻挠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扮演了一系列很不光彩的角色。

1956年10月22日，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全面展开之际，法国秘密机构检查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本·贝拉的飞机。

这就是令人震惊的本·贝拉绑架案。这一事件始于1955年的春天。

法国统治集团历来视阿尔及利亚为本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撒哈拉地区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后，法国政府便更加狂热地维护在那里的殖民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及利亚成为“战斗法国”的抗战基地，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经受了锻炼。1943年，阿巴斯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便开展活动，要求阿尔及利亚实行自治。法国临时政府竟于1945年5月8日，即德国法西斯投降的同

一天，在阿尔及利亚挑起流血冲突，屠杀了5万多人，成为法国殖民主义者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

此后，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

终于1954年11月1日午夜12时整举行了全民武装起义。本·贝拉作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他还团结其他爱国力量，共同组成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后来又创建了民族解放军。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波及到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国家，他们也在为自己国家的独立积极地准备行动，从而极大地动摇了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令法国殖民主义者恐惧不安。

1955年5月11日，法国政府召集部长会议，作出了一项“部级决定”：采取行动，求得民族解放阵线首要领导本·贝拉保持中立。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肩上。总部将这一使命委托给莫拉纳上校领导的行动处和在阿尔及尔建立的一个特别集团。不论对世界上的哪一个情报组织来说，民族解放阵线首脑的“中立”都意味着被“彻底消灭”。这一点从这次行动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越位。”

1955年7月13日，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在他的第546份报告中正式签署同意“越位”行动计划。

根据行动计划，在阿尔及尔专门成立了由热尔曼领导的情报处，后来该机构加入到了海陆空三军联合行动中心。它将在反间谍处和行动处之间，从电话监听处到第十一突击团的使用等方面，尽量采用一切可行的“技术手段”。热尔曼还收到了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总部开列的一份需要“清除”的6个人的名单：4个归热尔曼少校负责，2个归总局的行动处负责。

为了困住追踪的目标，热尔曼使用了设在北非的反间谍局的所有分站，随时向第十一突击团发出呼吁，同

时与行动处保持联系。

在“越位”行动的谋杀计划中，第一位需要“清除”的便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本·贝拉。

刺杀行动的负责人是安德烈·阿希阿里。此人是一位祖籍巴斯克、现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从事秘密行动的细胞。从1942年起，他掌管了博丹大街的警察局，因此，人称“博丹”。在阿尔及利亚，他受雇于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该局按月支付给他薪水，因此，受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指示，他处决了许多闹事的“叛乱分子”和轴心国派遣的特务，血淋淋的尸体漂浮在阿尔及尔港湾的海水中。

为了暗杀本·贝拉，阿希阿里也是煞费苦心，几次行动都险些杀死本·贝拉，但都未成功。1956年夏天，他曾在的黎波里独自策划了一次行动，因为他事先打听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主席要到那里去，但是，准备用手枪暗杀主席的行刺者却错过了时间。

在此期间，本·贝拉频繁地来往于北非国家中间，为促进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而不辞辛苦地奔波。面对一个像本·贝拉这样重要的目标，在几次暗杀行动未能得手后，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鉴于当时的北非形势，害怕暗杀行动带来不良的国际影响，于是，改变了手法，代之以绑架，并加快了行动的速度。

1956年10月22日，一场富有戏剧性的绑架行动开始了。

几天以前，热尔曼上校收到了来自摩洛哥反间谍处分站发来的情报：本·贝拉和他的几个朋友将乘君主穆罕默德五世的“超星”号飞机离开拉巴特，前往突尼斯参加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他们将飞过阿尔及利亚上空！

“这真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好时机！”热尔曼迅速向总部作了汇报。

10月19日，阿尔及利亚国防秘书长皮埃尔·肖萨德向空军第五军区的负责人下达了第4273/CM命令，这项指示明确了对即将“侵犯”阿尔及利亚领空的飞机进行全面检查的行动方案。

然而，事态发展突然急转直下。

11点30分，“超星”号准时起飞，然而，另一条可靠的情报来源网却突然宣布：本·贝拉没有走上此飞机，他已改换另一班飞机。

13点，在阿尔及尔的白屋军事监控站收到阿特拉斯航空公司DC3飞机的飞行计划。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从那里得知：本·贝拉等人就在这架飞机上，它的航行路线是：卡萨布兰卡——塞拉——乌季达——突尼斯。

16点，位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监控站与格拉利埃机长取得了联系。他们的对话后来载入了史册。

奥兰：“请找个出故障的借口，立即在奥兰降落。”

DC3：“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奥兰：“您的飞机上有五个‘坏蛋’，我们要抓住他们。”

DC3：“谁下达的命令？”

奥兰：“国防部！”

听到这里，DC3飞机上的所有机组人员都不安起来：这不是法国的飞机，如果采取行动，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降临在他们头上呢？显然，机组人员犹豫了。

19点30分，DC3飞机请求继续在摩洛哥上空飞行。

20点，阿尔及尔答复：“不能再飞越摩洛哥。立即停在指定地点。你们被包围啦……”

顷刻之间，几架密史脱拉飞机和一架 B26 飞机从奥兰起飞。“如果前面的飞机企图逃跑，你们就向它右边的发动机开火！”机长在机舱里也听到了这条命令——其实它不过是一种恫吓罢了。于是，机长决定着陆。

20 点 27 分，DC3 飞机按照白屋的指定地点降落了。一辆辆吉普车将它团团围住，一排排的机关枪也架了起来。在一名上校的带领下，几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蜂拥而入，闯进了机舱。

“请不要对我们有半点儿伤害。”本·贝拉向冲进来的士兵大声喊道。接着，他面向他的朋友们说：“请大家镇静，我从不相信法国人能够干这样的事！”

但法国人丝毫没有对他们客气。对热尔曼来说，他的确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 DC3 飞机一着陆、“接待小组”的人一上飞机，他立即给巴黎总部打了电话，他以胜利者的口气简单地宣布道：“目标 A 和 C，任务完成啦！”

接着，一架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飞机将本·贝拉一行带到了法国。从此，本·贝拉在法国开始了长达 5 年半的铁窗生涯。

1958 年 9 月 19 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本·贝拉被缺席任命为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1962 年 3 月 18 日，法国政府被迫同临时政府签订《埃维昂协议》。19 日，本·贝拉获释回国，并于 1963 年 9 月被当选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统，兼任政府总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64 年 4 月在民族解放阵线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

事后热尔曼上校回忆起当时的这一事件时这样说道：“本·贝拉不应该被绑架，我们收到的是暗杀他的

命令！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经过多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我们便抓住这次机会采取了这种绑架的强硬行动。这在航空史上还是首次。”

埃及原是英国殖民地，但法国在此也分享一份权益：它与英国资本联合控制着纵贯埃及中部，连接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的战略水道——苏伊士运河。可是在1956年，一场民族独立风潮在这里平地兴起，严重危及到了英法的殖民权益。

这年6月13日，埃及人民迫使英军全部撤出了埃及。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向全世界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法英政府如雷击顶，惊愤之余，断然决定对纳赛尔实施武力打击，发誓要夺回运河控制权。1956年10月的一天，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局长布尔西科在塞夫勒省的一座别墅里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们制定了一个秘密行动方案，即“火枪手”行动计划，目标直指纳赛尔。其做法是联合英国和埃及的死敌以色列，三家联手共同对付纳赛尔。

会议结束不久，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领导人在这座别墅里亲自会晤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国防部长达扬将军，以及英国外交部长塞尔万·劳埃德。“火枪手”军事行动计划就此在法、英、以三家之间达成了一致。

根据协同计划，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指示第十一突击团在塞浦路斯破坏“阿拉伯之声”广播电台，因为该台每天都用最高的频率宣传他们本国的革命运动。为此法国在塞浦路斯建立了“索姆拉”电台与埃及大唱反调，与之作对；而英国人则以塞浦路斯南部的济格希为根据地，建立了“夏尔克·阿尔—阿德纳电台”——后

改名为“近东阿拉伯广播公司”，直接受命于情报处。法英两家电台均向埃及广播，但收获不大。

“火枪手”军事行动计划最大的目标是刺杀纳赛尔。刺杀纳赛尔的梦想对法国情报机构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54年，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行动外的一个绰号为“托尔佩多”的预备役军人，就曾被委派去组织一次暗杀行动。后来，一个曾在中央情报行动局内部被人称为“邮船”的人——玛丽·佩莱在另一次暗杀行动中曾差一点击中埃及总统。

1956年11月5日，法、以、英三方参谋部继续实施摧毁埃及武装部队的行动计划：在以军首先在东面攻击埃及的西奈半岛，将埃军主力东引后，法英开始出动空降部队和登陆部队，在中部的运河北口下手，夺取塞得港、富阿德港及整个运河区。

是日拂晓，英国和法国的伞兵——第十伞兵师和第十一突击团的人——降落到富阿德港和塞得港。在自来水厂附近的树林里，由100多人组成的第十一突击团除了其中的两名队员搞乱了降落伞，死在了刺刀之下，其他队员还是按计划占领了这家工厂。总的来说，“火枪手”行动还算比较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步。在以色列部队东线的支援下，法英部队正在向胜利迈进。但是，这场突击苏伊士运河的战争却在国际领域里失败了。

11月7日凌晨2时，英法军队正沿运河南进之时，英法政府迫于美苏的威胁，下达了停火令。12月22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英法军队全部撤出了它们占领的埃及领土，伞兵们用鲜血换来的果实丧失殆尽。

撤出中东后，第十一突击团退回到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后方基地蒂帕扎。当阿尔及尔战斗打响时，这支部队

旋即又投入到了另一场殖民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中。1957年末，当格罗森将军即将上任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局长时，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又重新组织了几次反对纳赛尔的行动。

“是的，我们同其它国家合作，进行了不少次暗杀埃及总统的行动。”行动处的一位负责人这样回忆道：“1957年，在几次行动中，有一次是法国人自己搞的。两个特工人员潜入船中，安置好一颗炸弹。但是，此次行动的负责人发现有人跟踪他们，所以只好放弃了这次机会。由于盯梢者离得很近，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清除这颗炸弹了……”

被英国总理安东尼·艾登称之为“尼罗河地区的希特勒”的纳赛尔，非但没有被法国情报机构策划的暗杀活动所吓倒，反而继续领导和支持北非其他各国的殖民解放运动。

1958年9月，这位埃及领导人帮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开罗建立了临时政府。不仅如此，纳赛尔还允许民族解放阵线把埃及驻巴黎的大使馆当成海外活动基地。因此，为了阻止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决定设法打进埃及大使馆，揭开埃及使馆的神秘面纱。

1959年冬末的一天，一辆显得破旧的小型带篷卡车在巴黎乔治——比泽大街埃及大使馆后院的门前停下了，车篷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回收废纸、清理仓库”。

这时，一位年轻人从车上跳了下来，只见他按了按电铃，过了好一会儿，一个身穿绿色军服的埃及卫兵探出了脑袋。

“我是来收废纸的。”收破烂的人说。

卫兵示意他等一会儿，便关上门进去了。没有多久，与另一个守门人一起出来。守门人把收破烂的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只见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旧衣服，右手还拿着一顶破帽子。

“是讲好了的！大使先生知道。你把他带到地下室去吧！”守门人低声对卫兵说道。

“好吧，进来吧！”卫兵打开了一扇门，示意收破烂人进去。

由卫兵领着，收破烂人来到了地下室一个乱七八糟堆放着杂物的地方。积满灰尘的废纸、被老鼠咬坏的旧卷宗、破椅子、空瓶子，一层层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收破烂人用行家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废纸和废品的数量。

“好吧，”他说，“这活儿够我干两天的。还得叫个人来帮帮忙！”

这个衣衫褴褛的收破烂人，实际上是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名叫罗歇·多兰。而那个假装以很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多兰的守门人，则是第七处在使馆内安插的耳目。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这个守门人都要去替使馆发信。他总是先到一家小酒馆喝上几杯，在那里他把发信皮包放在地上。这时，法国特工人员便会出现，他也拿着一个皮包，和埃及使馆的那个皮包一模一样。特工人员悄悄地把两个皮包对换，然后带着使馆的信件皮包从后门溜走，直奔停在附近的装有特殊设备的一辆带篷小卡车。

顷该之间，信件被拆封、拍照，再用第七处久经考验的办法重新封好。几分钟后，特工人员回到酒馆，把皮包又换了回来。守门人喝完最后一杯酒后，便拿起皮

包，奔向邮局。就这样，法国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取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此后，随着阿尔及利亚战火越烧越旺，第七处决定进一步搞到埃及武官定期向开罗呈送的报告，因为这些绝密文件不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在外交邮袋里也找不到。但是他们知道，在使馆的保险柜里保存着文件的副本。

这一天，多兰在卫兵寸步不离的监视下，开始一个人装车。在他来回搬运时，鞋带松开了，他急忙弯腰系鞋带。当他站起来的时候，趁卫兵不注意他用手扶了一下后门的门锁。就在这一瞬间，他用藏在手心里的橡皮泥按了一个锁印。

“车子装满了，剩下的我再来一趟。”多兰告诉那个卫兵，并故意在地下室里留下了一些空麻袋，预备下趟再用。

当多兰离开地下室跳上车后，他心里在得意地说：“几个小时后，我将再次乔装改扮光顾这里，那时，我将不再以‘收破烂’的身份入内。”

当天晚上，勒鲁瓦亲自与多兰一起参加了这次冒险行动。他们开着带篷的小卡车来到了埃及使馆附近的美国广场，车篷上写着“雅克公司修锁配钥匙”。这辆车已被改装成活动工作间，里面有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灯光明亮，抽屉里装着修锁工具、电子器材，还有一台当即配制钥匙的机器。这是一个地道的“管子工”的全套工具。

开车的司机名叫福雄。勒鲁瓦与多兰一同离开汽车时，嘱咐司机留在车内监视大使馆周围的情况，并留给他一部微型步话机，它可以在几百米之内传递轻微的信号。他们商定的暗号是：外面一切正常，响三下；使馆

正门前面有危险，响两下；后门口有危险，响一下。

黑暗笼罩着整座建筑物。多兰拿着后门的钥匙走在前面，勒鲁瓦紧随其后，他们蹑手蹑脚地贴着使馆的墙根走，终于摸到了使馆的后门，接着，多兰向车内发回了安全信号。

在夜色当中，多兰小心翼翼地转动钥匙，轻轻地推开了使馆的后门。整个使馆一片寂静，只有二楼卫兵室的房间闪着灯光，屋内传来收音机里轻轻的乐曲。

两人像害怕黑暗的孩子一样，手拉着手，一直摸到了二楼。他们稍稍停了一下，位于楼道顶头房间里的卫兵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们直接上到四楼。由于事先他们得到通知，平时住在使馆里的首席参赞近日已经回开罗去了，于是他们很快便进入到了首席参赞的屋内。两人拿出实验室专门为特工人员制作的小灯，把灯叼在嘴上，以便腾出双手工作。他俩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迅速打开了保险柜，取出武官报告的副本，并把文件整理成堆，由多兰搬到地下室，装进他上午有意留下的那个空麻袋中。

然后，他们又来到档案室里，没有5分钟，保险柜也被打开了，这些文件又同样被运往到了地下室。

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确实难以置信。勒鲁瓦和多兰像两条抓住猎物的猎犬一样高兴，他们发出三下吱吱声，通知福雄一切顺利。

然而，就在勒鲁瓦和多兰准备离开的时候，步话机里传来了报警信号：后门有危险。

狂喜之下，迎头一瓢冷水！“怎么办，如果卫兵突然开始搜查，我们藏在哪里才不会被发现呢？”勒鲁瓦急中生智，对多兰说：“走，我们先藏到地下室去！”

幸好地下室还剩有一大堆废纸、空瓶子等破烂东西，构成一道可以藏身的屏障。在地下室里，勒鲁瓦蹬上一个箱子，冒着风险从气窗口向外面望了一眼，他发现刚才还是空无一人的广场，现在却站满了警察。

勒鲁瓦一时真有些慌了神，心想莫非是使馆把他们招来追捕我们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可真是糟透了！法国的秘密工作人员居然被法国政府的警察追捕，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处长居然在埃及使馆被他自己的同胞捕获，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无论如何，勒鲁瓦和多兰不敢贸然出来。就这样，他们在破烂堆里呆到早晨6点。上午，使馆对面的广场上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原来大批警察开到这里是为了警戒。

百无聊赖中，勒鲁瓦信手翻弄着那些作为废纸扔下的文件，令他惊奇不已的是，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些埃及人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大人物付款的会计单据。勒鲁瓦如获至宝，把这一卷废纸捡起来，装进他们要带走的麻袋里。这真是出乎意外地为他们这次窃取机密文件的收获来了个“锦上添花”。直到当晚警报解除后，他们才悄然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多兰依旧是一身“收破烂儿”的装束，堂而皇之地取走了地下室中的废纸和装满机密文件的麻袋。

在巴黎南郊一座路易十三时代修建的古老钟楼里，第七处的情报人员对这些“破烂儿”进行了分析整理。在整理过程中，他们还破译了埃及的密码，由此，这些搞来的文件被全部翻译出来。然后，按照日期，分成外交、军事、经济三大类，一包一包地送往总部，主要是

送往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中东科”。同时，让所有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斗争的警察部门、反间谍部门都能利用这些情报。

一场对埃及使馆的“出击”行动就此落下了帷幕。

巧施妙计截断阿尔及利亚军火源

对埃及使馆的成功“出击”，也使勒鲁瓦获得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这就是埃及正源源不断地为他的邻国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反殖民统治的武装部队转运武器和输送资金。

更让勒鲁瓦恼火的是，一些走私商人也借战争发横财，他们冲破层层封锁，把一船船军火运送到阿尔及利亚。尽管法国海军派出巡逻艇对北非沿海地区进行了严密封锁，但是军火走私仍然屡禁不止。

“必须坚决截断军火源！”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向第七处发出了强硬的命令。

从此，第七处出现了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军火交易问题的新单位，这就是军火交易科。

为了大力加强第七外军火交易科的工作，勒鲁瓦广布情报人员，刺探有关军火交易市场的情报，并建立了大量的档案。一个偶然的机，勒鲁瓦通过一个旧货商人，掌握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部队采购武器的渠道。

当时，勒鲁瓦受领了一项由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远东科交给的任务，这就是秘密潜入儒维西附近一座别墅，那里住着越南保大皇帝的一些亲信。远东科的人指示他，这所住宅是某些谍报人员的中转站，法国和亚洲之间的一大批信件都在这里转手。他们要求勒鲁瓦暂时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施展第七处人员久经考验的本领，悄悄溜进别墅，用微型照相机把文件拍摄下来。

然而，勒鲁瓦感到困难的是，他们将装扮成什么人才能接近一座黄种人居住的别墅呢？假充德国人、比利时人或意大利人，是没有问题的，可要冒充亚洲人就难了，得费尽心思，乔装打扮一番。

最后 勒鲁瓦决定先派遣几个人化装成宪兵和神甫，前去侦察地形，为采取行动做准备。可到什么地方才能弄到需要的服装而又不引起怀疑呢？勒鲁瓦为难了。

这时候，新近才来到第七处工作的卡特里纳警官为勒鲁瓦解决了难题。他找到处长说：

“我认识一个叫帕斯基的人，他是个旧货商，他买下了大批美国在二战期间留在欧洲战场上的剩余军用物资，伏利——梅里古尔街上有一座巨大的木板房就是他的仓库。我曾经去过那里，里面堆着各式商品、设备和服装，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他向巴黎所有的剧院出租服装。在他那里，你既可以化装成海军上将，也可以化装成红衣主教或治安警察。”

勒鲁瓦听后，心里并不十分乐意同这个人去接触并从他那里弄到衣服。在他的心目中，他并不怎么相信旧货商和卖废铜烂铁的那号人，他认为，这号人的活动近乎偷盗。但是，难题又无从解决，无奈，勒鲁瓦只得勉强同意卡特里纳提出的建议，在这个旧货商那里给预定参加儒维西行动的特工人员量衣服尺寸。很快地，他们所需要的宪兵制服和神甫长袍发到了参加行动的特工人员的手中。以后的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

勒鲁瓦对卡特里纳说：“很好，不过我想只这一次，我可不愿意与这个旧货商人再有什么牵连。”

勒鲁瓦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厌恶的这个旧货商人竟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一天，卡特里纳兴冲冲地来找勒鲁瓦说：“现在，你应该摒弃对旧货商的厌恶，到帕斯基那里去一趟，这可能会使你感兴趣的。”

勒鲁瓦抑制住不快的情绪，问道：“那是为什么呢？”

卡特里纳回答道：“我了解到了，这家伙近来接待了两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来向他订购游击队的军服的，他们甚至还要他帮忙弄一些部队用的胶底鞋。”

听到这里，勒鲁瓦顿时警觉起来。当时正是 1954 年年底，阿尔及利亚起义的烈火正在蔓延，第七处的军火交易科已开始对军火商进行监视。

卡特里纳见勒鲁瓦态度有所改变，于是高兴地向他建议：“阿尔及利亚人还会去找帕斯基，到时候，我们可以叫人盯上他们。”

然而，在勒鲁瓦看来，这种做法并不妥当。

“我认为对那两个阿尔及利亚人最好不要进行任何监视，”勒鲁瓦思考了片刻后说，“你去告诉帕斯基先生，叫他接受他们的全部订货，并设法让他们付足一笔定金，好让他们放心。我负责给他弄军用胶底鞋。”

在多莱尔总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和图样设计师反复研究如何在这种特别适用于在北非山地行走的军用胶底鞋上搞一个明显的标记，以使法国的部队在战场上能够发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部队的行踪。当然，勒鲁瓦也考虑到一切都要注意不能让阿尔及利亚人识破“窍门”，否则，他们的行动就会彻底失败，卖主帕斯基也会永远失去阿尔及利亚人的信任。

办法终于想出来了。这种鞋的后跟上一向都带有一行表示生产批量的非常小的数目字，勒鲁瓦考虑可从在

第七处的工作间里把其中的一个数字印成另一种十字形状，并且使它微微凸起，这样就能在地上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记。于是，勒鲁瓦向供应法国军队的一家公司订了货，并按上述办法对胶鞋逐一作了处理。

就这样，4万双鞋通过帕斯基送到了阿尔及利亚。穿上新鞋的阿尔及利亚人在沙土地上留下了脚印，法国士兵毫不费力地就发现了阿尔及利亚小股部队的行踪，消灭并俘虏了许多民族解放军战士。然而，好景不长，鞋底很快便磨平了，那个明显的标记也不复存在。

在以后的日子里，勒鲁瓦主动找到帕斯基，促使他也从事军火买卖。法国人的目的是要帕斯基在他们的操纵下向阿尔及利亚人推销大批军火，以切断其他军火商的运送渠道。

此外，为了控制军火交易，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还在国外，主要是在西德、瑞士和西班牙等国建立了自己的军火公司，目的在于垄断军火市场，限制阿尔及利亚的武器采购。这些公司并不是徒有虚名的皮包商，而是货真价实的贩卖武器的公司。只要顾客不是法国的敌人，这些公司完全按正常的武器经营方式向他们供应武器，所得收入全部上缴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闻名欧洲的马德里军火公司便是由法国情报人员直接经营的。

这些披着军火出口商外衣的情报人员也得以在从事军火生意中暗中搜集别国的经济变化、外贸出口、物资消耗、军火生产企业等方面的详细情报。

法国人在与阿尔及利亚人进行军火交易中使尽了手腕。

例如，在与阿尔及利亚人进行军火买卖中，法国人要求买主必须用现金支付，为此，阿尔及利亚人就不得

不从他们的军费中拨出大笔款子付给卖主，法国人则拿了他们的钱却借故拖延时间不付货，这样就可以渐渐地掏空他们的钱囊，使他们“窒息”。

又如，法国人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售给阿尔及利亚人的武器绝对送不上战场，而法国人的任务正是截获这些武器。要么运送的武器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不像样子：弹药受潮、弹簧松弛、部件残缺，士兵根本无法使用；要么运货的船队在海上被法国海军检查扣留。

此外，当时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还拥有一支轻型舰队，可以短期靠岸，秘密运送人员。法国海军还向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临时调拨了一艘小型潜艇和两艘扫雷舰。通过行动处的海上破坏活动，法国舰队击沉了驶往阿尔及利亚的快艇、货船、沿海船只 14 艘，共有 2000 吨军火沉入大海。

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截断军火源的一系列行动，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以沉重的打击。

1958 年 5 月，阿尔及尔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军事暴乱，使得隐居了 12 年之久的戴高乐重新复出，也由此改变了阿尔及利亚的命运。同年的 6 月，鉴于阿尔及尔军事暴乱所引发的法国国内政治危机，国民议会以 329 票对 224 票通过授权戴高尔组阁，并给予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并于同年 9 月登上了法国总统的宝座。

重新出山的戴高乐总统决定结束在北非的战争，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权。1962 年 3 月 18 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埃维昂签订停火协议，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宣告结束。长期以来，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到 1954 年发展为全民武装起义。

1958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诞生,1960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开始会谈。在达成停火协议后,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利,承认阿尔及利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

战争结束后,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进行了一次大精简。在精简过程中,军火交易科是局里首先遭到精简的单位之一。随后,军火交易科那些优秀的专家都转入私人企业,有些特工人员后来成了地地道道的军火商。

布隆迪独立

布隆迪16世纪时建立了封建王国。1890年沦为“德属东非保护地”。1916年被比利时军队占领。1922年成为比利时的委任统治地。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布隆迪交比利时托管。

1962年6月27日第16届联大通过关于布隆迪独立的决议,7月1日宣布独立,实行君主立宪,称布隆迪王国。

卢旺达独立

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两侧,内陆国家。西和西北与刚果(金)为邻,北与乌干达接壤,东与坦桑尼亚毗连,南界布隆迪。全境多山地和高原,有“千丘之国”之称。大部地区属热带高原气候和热带草原气候,温和凉爽。

16世纪图西族人在卢旺达建立了封建王国。19

世纪中叶起，英、德、比势力相继侵入。1890年沦为“德属东非”保护地。1916年被比利时占领。1922年根据凡尔赛和约，国联将卢“委托”比利时统治，成为比属卢安达-乌隆迪的一部分。1946年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仍由比利时统治。1960年比同意卢“自治”。1962年7月1日宣告独立，定国名为卢旺达共和国。

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1991年6月卢实行多党制。

英法于1962年签署合作协议制造协和号飞机

协和式飞机的历史可追溯到1956年，当年英法开始第一次超音速试验，在取得初步成果后，英法于1962年签署了两国工业合作协议，1967年第一架样机在法国图卢兹组装厂下线，1969年协和001号飞机做第一次试飞，1973年第一架飞机正式出厂，两年后取得飞行许可证，1976年英法两国正式首次投入商业运营。1977年正式首航美国纽约。至2000年7月法航一架协和飞机失事以前，协和式飞机一直运营正常。

经过27年高贵而荣耀的飞翔，协和式飞机(Concorde)，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音速客机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退出商业运营。

法国航空公司(AirFrance)和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Airways)近日证实了这一消息。法航总裁J-CSpinetta称，法国航空公司和英航已经达成了协议，将于今年10月31日，将所有的协和式飞机退出运营，法国方面将比其英国同行更早一些，将于今年5月31

日撤出。这一决定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这又是形势所迫，别无其他选择。

2000年7月，法航一架协和式飞机在法国 Gonesse 失事，造成 113 人死亡，此后 Concorde 停飞了 16 个月，尽管做了很多的技术测试和改进，但自从 2001 年 11 月恢复航行以来，仍然小事故不断，协和的声誉一落千丈。而且加上目前的世界经济萧条和对伊战争，协和飞机的上客率直线下降，目前已经落到可承受的 20% 以下，法航著名的往返巴黎—纽约的 AF001 航班最近一个班次只有 12 名乘客，竟空余 80 个座位。另外飞机的维护保养费用也高得惊人，自恢复航行以来，每小时的费用比以往增加了 72%。协和目前的运营已经成为了承重的、结构性的赤字负担，再进行下去，无疑是不理智的。

英航将比法航推迟几个月关闭此航线，因为目前英航拥有 7 架协和式飞机（而法航是 5 架，且只有 3 架真正投入运营），同时还有着大量的飞机配件库存，另外，在协和停飞期间，英航曾投资 1 亿英镑用于机舱的修缮，英航希望能利用这段时间减少一些损失。

尽管有诸多经济方面的因素使然，但协和的退出毕竟显得有些凄凉，曾经在 60 年代末以其优美流畅的曲线、先进的科技而辉煌一时，赢得世人的交口称赞，而今却红颜薄命，过早的香消玉陨了。不过有很多博物馆、基金会和其他组织曾多次要求在飞机退役后收藏这些飞机，给这些飞机找到了一个光荣的归宿，这多少也表明了他们的历史价值。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其他的超音速飞机和协和式飞机竞争，唯一还称得上是“对手”的是前苏联的图-144(Tupolev)飞机，从技术到外型几乎完全仿制英法协

和飞机,但其命运多桀,在1973年的巴黎布尔热航展期间,即坠机而亡。此飞机的商业运营只在1978年试行过一段时间,且只限于前苏联国内航线。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花了10年时间并耗资4亿美元,以期完成研制美国超音速飞机的SST计划,但也在1978年就夭折了。1990年初,人们对超音速飞机又感兴趣起来,并认为世界市场的需求量可达到1000架,为此一个集中全世界波音、麦道、欧洲宇航集团、英国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Alenia)和图尔等大航空公司最优秀人员的工作组应运而生,但是最后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1994年开始,美国宇航局(NASA)又汇集了波音、麦道、通用电气、Pratt & Whitney 等公司,斥资15亿美元,试图研制一种能载300名旅客,速度为音速2.4倍的飞机;欧洲方面,欧洲宇航、德国航空航天集团(DASA)等集团亦在实施同样的计划,即研制超两倍音速,载客250名的超音速飞机。但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唯一与协和式飞机比较接近的是美国波音公司1990年研制的SonicCruiser飞机,接近音速,原本是为了与欧洲未来欲发展的超宽体客机A380竞争而设计的,但美国各航空公司对此机种兴趣不大,最终被放弃。到目前为止,仍在继续研制中的超音速飞机只有日本通产省资助的一个项目。专家预言,新一代超音速飞机的诞生,至少等到2025年以后。

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被处死

阿道夫·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工具,是纳粹德国行将崩溃前执行丧心病狂的“彻底解

决方案”的负责人，在被屠灭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跟他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尽管惩罚艰难，但是，艾希曼最终还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艾希曼案件实际上延续了纽伦堡审判创立的规则：一个人因为接受军事命令而犯下罪行，他将承担作为一个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豁免权。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与罪恶职责的冲突，来自自然法的正义观念维护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在德国出生，8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并开始发迹，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头。不久，他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1936年，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头。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和伎俩，艾希曼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收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又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1938年，他获委派负责驱逐犹太人的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二战结束后，艾希曼被捕入狱。但后来，他设法从狱中逃走，到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化名克莱门特与妻子和3个儿子一起生活。1960年5月11日晚，以色列特工以非凡的胆略和周密的计划绑架了艾希曼，并且将他安全地劫持到以色列。1961年4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1961年12月15日，艾希曼以屠杀200万犹太人的罪行，被定为反人类罪、反犹太罪，以

及参加犯罪组织罪而判处绞刑。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伏法受刑。临刑前他还道出了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摩萨德的嘉许之词：“抓我这件事，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十分出色。”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不揣冒昧地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多年在秘密警察和情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1962年6月1日，在太阳还未升起之际，以色列人把艾希曼的骨灰倒入远离海岸的一碧万顷的大海之中。

艾希曼曾经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疯狂的屠杀行为是在恪守职责，因此他本人不应对屠杀罪行承担责任，当然，这样的自我辩护遭到所有人的痛斥。艾希曼把所谓的恪守职责置于其人生的最高地位，而且这种职责在本质上既没有接受理性的检验，也没有经受良心的拷问，更没有接受更高境界的检验，艾希曼恪守的仅仅是一个人——希特勒的命令他承担的职责——不管这种职责是多么可怕，而他依然忠贞不二，这是偶像崇拜的必然结果。

具体实施罪恶的个人往往都有一个基本遁词，就是“我是在恪守职责”。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于什么是职责或者什么是人类所需要的职责进行必要的最低限度界定，否则人们的思维将是混乱的，思维的混乱必将造成行为的混乱，而行为的混乱必将给人类造成灾难。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职责就是职务和责任，词典又将责任解释为“1、分内应做的事；2、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当。”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第一种解释。因此对于什么是职责就是讨论什么是所谓的“分内”，分内成为职责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按照通常的理解，分内就是本分以内，那么什么是本分？如

果我们再去查《现代汉语词典》，发现本分是指本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轮流解释说穿了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关于什么是职责的答案，因为我们似乎已经陷入一个语义循环之中，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职责的含义，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那篇题为《语言的本质》中精辟地指出：“如若在语言中真的有人的此在的本真的居所，而不管人是否意识到这回事情，那么，我们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就将使我们接触到我们的此在的最内在的构造。”

[1]因此，在这里，如果我们撇开翻译的可能不到位，那么“内在”和“此在”以及“构造”三个基本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词语的基本内涵，对于职责一词我们是否可以按照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和长年累月形成的思维习惯以及人们由于传统而形成的理解语义的能力，还有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已经能够被接受和即将被接受的价值观中寻找语义的真实内涵。而且当我们发现职责这个词其内涵实际上旨在反映人类交往过程的一种特性时，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词的语义指向，而必须确定这个词的文化内涵，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这里所谓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既是动态的又据有相对稳定性的概念。说得更为明确的话就是，我们必须了解职责这个词背后的价值观[2]。也就是说，职责这个词的真实内涵必须显现它在被表达时所指向的具体内容后面所依托的东西，这种依托的东西就是指表达这个词的人在他内心中由他自己理解的该词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使用这个词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否则，如果我们不知道使用这个词的人价值观是什么，那么相对于他而言，这个词失去所有的意义。而且，当我们了

解了使用该词的人的价值观时，我们才可能知道他所使用的词与我们所理解的是否一致，以及如果不一致，为什么他理解的是对的，而我们理解的错的，或者刚好相反——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彼此价值观差异的结果是否导致了某些触犯人类基本生存准则的行为产生。

现在，我们在确定了职责这个词应当包含使用者的基本价值观内涵后，我们就可以分析艾希曼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恪守职责”中职责的真实含义了。艾希曼作为一个法西斯党徒，他的基本价值观中至少包含两项内容，一、效忠元首即希特勒，就是不管希特勒下达什么样的命令，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二、种族主义观念，即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对于他们可以进行种族屠杀。另外，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军人服从军令是天职的观念在所有国家都被奉行，而在纽伦堡审判之后，这一观念被增加了一个前提，即军令不得违反基本的国际法战争规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否则军人不得因为这一观念而为自己的反人道罪辩护，并且这一前提规则具有溯及力。至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效忠希特勒只是效忠一个具体的人，希特勒的法西斯理论由于其现实的后果已经被证明违背人类生存的基本准则，因此如果是因为奉行了希特勒的命令屠杀非武装（犹太）人员，即属于反人类罪，艾希曼恪守这样邪恶的职责当然不能为其罪行开脱。两种不同价值观下产生的职责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艾希曼的价值观使得他所产生的职责含义与遵循人类基本生存准则而产生的职责含义不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是完全相对立的两极，因此舍前者而取后者。

人类社会由于生存的需要，就必须有一些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没有这些规范，社会就丧失基本的存在依

据和维系纽带,这些基本规范往往是一些原则性的内容。个体的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与这些基本的社会准则会发生种种关系,这些关系中有和谐的统一,也有纷争的冲突。那么哪些规范是基本规范就显得非常重要。1993年9月4日,世界宗教议会通过并签署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宣言指出人类正面临着不必要的苦难,要解除这些苦难就得有一些全世界都能认同并且能够付诸行动的普世性伦理,否则人类社会将难以为继,这些普世性伦理包括以下内容,首先,“面对所有的人类,我们的宗教和伦理信念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3],这是基本要求;与这一基本要求相应的有如下四项不可取消的原则:“1、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2、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3、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4、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4]宣言同时论证说,这些原则在所有古老的宗教经典中相应地被表述为“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撒谎”“不要奸淫”[5]宣言还指出,无论是信仰宗教的,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对于这些最最基本的伦理都应当持守,否则人类将无法共同和平地生存。我想我们似乎可以将上述的宣言内容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底线伦理,所谓底线伦理就是人的行为必须要有一个底线持守的原则,挣脱这一底线的后果就是侵害了他人的利益,就陷入罪恶。

可以说,世界宗教议会的这一宣言恰恰道出人类之所以有无限灾难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类没有遵循这些基本伦理,世界上才蔓延着如此多的丑恶和灾难。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不就是一个最有力量的说明吗?可是两次大战以后,人类又安稳过几年?即

便是在和平时代，世界上的局部战争还不是年年有，月月有？更为可怕的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的人民一直就生活在毫无人权的社会中，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安宁都是侥幸——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因就被剥夺自由，被虐待，甚至被屠杀，他们生活在政府制造的恐惧之中，同时社会上永远存在的犯罪行为给善良的平民百姓造成的痛苦还无法完全按照司法程序实现正义。实际上，这些完全人为的苦难都是因为立法者在立法上的不平等和执法者的侵权以及司法者的枉法所致。

对于今天的世界图景而言，提倡全球伦理或者底线伦理是非常有价值 and 必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认同上述世界宗教议会的宣言，那么，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基本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最低伦理要求。用这些基本规则，我们可以检验运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规则，这些其他规则包括现行的法律，根据“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原则，我们可以检验所有国家的所有立法是否存在不平等，当然在这里，平等的目的是人道主义而不是平等本身，否则不顾及人道的平等恰恰是不正义的，如果一个国家上到宪法，下到一般的行政规章中出现了对不同人群的权利进行不同对待的话，我们就有理由质问这样的法律是否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尤其是一项法律是否给拥有某种强势[6]能力的人群以更多的权利优势，例如规定在同一个国家里，给予某部分公民（比如男性公民）以求职上的优先权[7]，如果法律在一般性问题上存在着对于某部分公民有赋予特权的动机和结果，这项法律就有可能是不正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相同资格的人群给予不同权利的法律如果违

背了人道主义（我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理解为给予每一个人以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障）原则，将是不正义的，这样的法律就不是以正义为核心内容的法律，所谓恶法非法就是这个意思。立法上存在着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行政执法也一样，如果一项法律本身已经突破了底线伦理，那么这项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职务上的不折不扣执行就会成为他作为一个人对基本良心和道义的违背，即违背了作为人的基本职责，因此，执行者因为违背底线伦理侵害他人的正当权利而成为罪犯，例如某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剥夺信奉某种宗教者的人身自由，警察去恪守职责地执行，把某类宗教的信徒抓起来——仅仅因为他们信奉这种宗教，那么不但法律因为不符合正义而没有自然法效力，执行者也因为执行它而成为罪犯——因为执行者并不是机器，他应当具有基本的良知，他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当然，如果执行者在执行一项正义的法律过程中有其他非法犯罪行为则是另外的问题，已经属于渎职行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在司法过程中，恪守职责的犯罪也依然存在，即某项法律明显地违背基本人道主义精神，明显的非正义，如果法官还要适用该项法律，以此造成无辜者的受侵害，那么该法官的判决就是一项犯罪行为，应当受到自然法的审判——因此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是合乎正义的。

一个社会仅仅依靠法律是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法律是一种不得已的约束，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约束自己，它作为一种他律的外在于人的规则必须以人的内在约束为基础，没有自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他律获得成功的可能。这里的自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人们对上述底线伦理的遵循，没有这些底线伦理，法

律将失去生长的土壤和依托的根据。没有底线伦理，法律脱离底线伦理就会相应地出现大量的非人道立法、非人道执法、非人道司法，这样随着就会出现大量罪恶职责，并且人们会以此作为自己犯罪的借口，于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社会准则就被打破，邪恶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汉娜·阿伦特在分析艾希曼的自我辩护时非常深刻地指出，这是一种被正常化了的邪恶（有的地方译为平庸的罪恶），它比没有职责作为借口的邪恶更加可怕，因为没有借口的邪恶至少还会使罪犯在心灵深处受到谴责，可是有了职责作为借口，犯罪就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正常甚至“正当”甚至“高尚”的职业，罪犯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社会就成为一个可怕的屠宰场，许多人可能甚至为此而成为合法的犯罪狂，在他们眼里，这些罪恶能够成为它们谋生的手段和来源，在此基础上，罪恶必将迅速繁殖，如核裂变一般波及整个社会，久而久之，社会即便不走向灭亡，也会走向混乱和动荡。德国著名神学家朋霍菲尔在论及内在正义时说道：“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加有力。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8]朋霍菲尔在此指出的法则就是指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底线伦理，他所谓的不智就是指社会脱离了底线伦理必将走上穷途末路。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国家范围也好，还是从全球来看也罢，都需要底线伦理，如果没有大家共同认同的底线伦理，这个社会不会处于安宁状态。但是，人们会问，底线伦理怎样形成，共识如何形成，这当然是极其重大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一般

而言，底线伦理的共识会在一个社会的长期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如果这个社会一切以强力甚至暴力作为后盾来维持稳定，而不是以人们普遍认同的以尊重生命为基本追求的价值观，以及以该价值观下的基本伦理法则和外在的程序严格的法律来维系整个社会的内部稳定，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就缺乏正义，因此它的动荡不安，它的暴虐性就成为它永恒的象征和永久的轮回。从历史上看，追求尊重生命的哲学最主要来源于宗教，它是追求生命本身价值的集大成者，它不但满足了人类在信仰上的本能需求，同时也解决了社会最基本的内部稳定问题，但是由于人类信仰的多样性也导致了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于是战争破坏了人类的安宁，也亵渎了信仰本身，因此当人类回过头来反思这一切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只有宽容不同的信仰，才能达成相处的基本共识——这时底线伦理就形成了。在这里，我用三言两语无法将这个问题探讨得十分清楚，我个人认为，底线伦理的形成就是来源于不同信仰之间的长期斗争。没有不同信仰之间的长期博弈，就不会有尊重生命的原则被大家共同遵守，没有公认的尊重生命原则，邪恶就会成为社会常态，而人们渴望的底线伦理却永远不会形成。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逝世

赫尔曼·黑塞（1877 - 1962）是 20 世纪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 20 世纪文学在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作家。一个浑身上下生前身后全是矛盾的人。

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年7月2日出生

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一个叫卡尔夫的小城市。他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后来自己也进入了一个神学校，但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半年后就逃离学校。

1904年，黑塞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令他一举成名。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克努尔普”（1916），“德米尔”（1919），“席特哈尔德”（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东方之行”（1932），“玻璃球游戏”（1943）等。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一年，德国作家黑塞出人意外地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黑塞已于1923年加入了瑞士籍。

作家黑塞的一生充满矛盾，或者说，许多事情在他那里是“成双结对”的。

浪漫与现实的结合。有些评论家说，黑塞是德国浪漫主义最后一名骑士。这个评语没错。但他的作品的出版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的编辑米歇尔斯认为，黑塞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性的。这也没错。无论是遥远的印度（席特哈尔德），还是中国长老（玻璃球游戏），都有他自身的“体现”。但他不甘心“简单的”现实，他永远地给现实抹上理想的色彩。那实实在在是浪漫主义。

哲学与文学的结合。跟许多德国作家一样，黑塞更善于，或者说更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去看世界。他好象总想追求什么，他好象总想说明什么。在“荒原狼”里，他分析人性与狼性；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里，他把他的主人公简单地分为两个人，代表“理性世界”的纳尔齐斯与代表“感性世界”的歌尔德蒙；在“席特哈尔德”里，他探索东方的教义；在“玻璃球游戏”里，

他进一步化入道德经。

西方与东方的结合。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去吸收养份，是 20 世纪不少西方文人的作为。在美术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毕加索，在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便是布莱希特和黑塞。

黑塞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为东方所迷，迷了他一生的是易经，是老子，是道德经。1911 年 9 月至 12 月，作家游历了印度、锡兰、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地，由于中国正闹辛亥革命，未能进入中国。但他此行“最主要的、也许可以说最强烈的印象是中国人”，“和中国人比较，印度人的世界虽然色彩斑斓，却一切全都分崩离析。在东方，唯一令人钦佩的是中国人”。

在“席特哈尔德”中，他写的是印度，是婆罗门教社会，但写着写着，他却“跑到中国”去了。他在作品快结束时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谈到作品主人翁是这样说的：“那人穿着印度服装，他启程时是波罗门和佛陀，却结束于道”。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黑塞在‘席特哈尔德’中所写的不仅是老子的学说，而且也向读者展现了老子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重了黑塞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在 1932 年的“东方之行”和 1943 年的“玻璃球游戏”里，他进一步到东方哲理中寻找他的理想境界。“玻璃球游戏”里的中国长老是公认的黑塞自画像，禅修的代表，而那音乐大师更是老子的化身。

然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毕竟只是黑塞的一种寄托，而黑塞始终是德国人，西方人，他变不了中国人。无论他写的是印度还是中国，他写的还是德国人西方人的品质、心态。战后，黑塞在西方大受欢迎，可以说是

震撼了西方年轻人的心灵。但如果是中国年轻人去读他的著作，大概很难有一种振动感吧。基尔许霍夫说得很有意思：“他已变成一个中国人，却没有终止成为西方人，甚至仍旧是个施瓦本人。”

是“平民作家”还是“贵族作家”？这是直到黑塞身后，而且尤其在他身后，仍然纠缠不休的问题。黑塞有轰动效应，这是德国作家中所罕见的。他的著作全球销售量早已突破1亿册，使他成为20世纪读者最众的德国作家。把古往今来的都算上，德国文学在全世界的读者超过黑塞的只有格林兄弟。60年代，黑塞去世后，他再一次轰动世界，他居然成了全世界嬉皮士的偶像。“荒原狼”这个词是那时西方家喻户晓的概念。

另一方面，黑塞始终没有得到文学评论界真正的承认。不少评论家甚至认为他是“伪文学”的代表。但评论界也有给予黑塞高度评价的。托马斯·曼甚至把“玻璃球游戏”与“尤利希斯”这样的现代派经典作相提并论。诺贝尔奖评委会也好歹“误会”了一把——诺贝尔奖从来还没有给过通俗作家。

说实在的，文学评论界不太认可黑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浪漫派的最后一个骑士”，因为他不是现代派的人。现代派才是文学评论界的“自己人”。黑塞也尝试了现代派，比如荒原狼，比如玻璃球游戏，他至少从哲学的角度去尝试了。但他骨子里还是浪漫派，这是他所无法掩盖的。

话又说回来，做个平民作家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到那“圣殿”上去充个“贵族”呢？那1亿的发行量，足够让人自豪的了。

话再说回来，黑塞还不是真正的平民作家，象卡尔·

麦那样。他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矛盾体。就象他不是中国人，也不太象德国人那样，他不是贵族作家，但也不太象平民作家。

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逝世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埃莉诺成为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对民权运动十分支持，认为种族歧视是不民主的行为。埃莉诺刚成为第一夫人，就宣布自己要聘用黑人帮她管理家务。

1938年，埃莉诺出席在伯明翰召开的南方人类福利会议。当地法律规定，黑人与白人必须分别坐在走廊的两边。埃莉诺愤然向工作人员要了把椅子，不顾四周白人的惊愕表情，毅然坐在走廊上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埃莉诺明白民权问题在二战期间的重要性，因此，她在战争期间反复强调，如果没有非洲裔美国人的民主，那么美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为此，埃莉诺受到了不少威胁，然而她却毫不畏惧，仍常常深入华盛顿的黑人聚居地进行调查。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逝世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年10月7日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父亲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03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物理，1909年获科学硕士学位，1911年获博士学位。大学二年级时研究水的表面张力问题，自制实验器材，通过实验取得了精确的数据，并在理论方面改进了

物理学家瑞利的理论，研究论文获得丹麦科学院的金奖章。

由于对卢瑟福的仰慕，于1912年3月到曼彻斯特大学在卢瑟福领导下工作了4个月，当时正值卢瑟福提出了他的原子核式模型。人们把原子设想成与太阳系相似的微观体系，但是在解释原子的力学稳定性和电磁稳定性上却遇到了矛盾。这时玻尔开始酝酿自己的原子结构理论。

玻尔早在大学作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时，就考察了金属中的电子运动，并明确意识到经典理论在阐明微观现象方面的严重缺陷，赞赏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在电磁理论方面引入的量子学说。在他研究原子结构问题时，就创造性地把普朗克的量子说和卢瑟福的原子核概念结合了起来。在玻尔离开曼彻斯特大学以前，曾向卢瑟福呈交了一份论文提纲，引入了定态的概念，给出了定态应满足的量子条件。回到哥本哈根后，1913年初，有朋友建议他研究原子结构，应很好地联系和应用当时已有的丰富而精确的光谱学资料，这使他思路大开。通过对光谱学资料的考察，玻尔的思维和理论有了巨大的飞跃，使他写出了“论原子构造和分子构造”的长篇论著，提出了量子不连续性，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1921年，玻尔发表了“各元素的原子结构及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长篇演讲，阐述了光谱和原子结构理论的新发展，诠释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对周期表中从氢开始的各种元素的原子结构作了说明，同时对周期表上的第72号元素的性质作了预言。1922年，发现了这种元素钷，证实了玻尔预言的正确。1922年玻尔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0年在玻尔筹划下创立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成为世界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这个研究所不但以其一批批出色的科学成就而为人所知，而且以其无与伦比的哥本哈根精神著名，这就是勇猛进取、乐观向上、亲切活泼、无拘无束的治学风气，各种看法通过辩论得到开拓和澄清。玻尔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达四十年，起了很好的组织作用和引导作用。

3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许多由中子诱发的核反应，迫切需要一种合用的核模型，玻尔提出了原子核的液滴模型，对一些类型的核反应作出了说明，相当好地解释了重核的裂变。

1943年，玻尔从德军占领下的丹麦逃到美国，参加了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但对原子弹即将带来的国际问题深为焦虑。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玻尔很快回到了丹麦继续主持研究所的工作，并大力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1962年11月18日，玻尔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

小资料

世界上第一颗通讯卫星进入轨道。

牙买加独立。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独立。

美国第一个黑人大学生入学。

第二届梵蒂冈理事会召开。